

## 試論秦漢的「逕(逮)」、「逮捕」制度

高震寰\*

關於秦漢簡中的「逕(逮)」，學界至今有兩種意見。一派認為「逕(逮)」指逮捕，另一派認為只是傳喚而未捕。本文認為兩說都只把握到一部分的事實。根據本文的考察，「逕(逮)」是描述官吏治獄時，以某種方式使案情關係人到案，作為治獄參考的程序。根據所「逕(逮)」對象涉案深淺與情節輕重不同，會採取不同的手段。若是傳喚證人或輕罪者，治獄吏一般會發文至欲「逕(逮)」對象的縣或所屬單位，告知當事人主動到案說明或應訊。這種辦法稱為「逮」，差似於今日之傳喚。但針對可能逃跑或拒捕之重罪犯，治獄吏會以密件通知所「逕(逮)」對象的縣或所屬單位，要求在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予以拘捕，並傳送至治獄單位。由於是根據「逕(逮)書」拘捕人，因而當時稱為「逕(逮)捕」。「逕(逮)捕」是「逕(逮)」的一種辦法，卻不完全等同於「逕(逮)」。與今日普遍意義的「逮捕」一詞可用於描述拘捕現行犯、通緝犯不同，秦漢的「逕(逮)捕」只用於描述因應「逮」程序的拘捕。當時針對通緝重犯的捉拿稱為「名捕」、「命捕」或「逐命」，不稱「逮捕」。從唐代、明代史料看來，「逕(逮)」作為類似今日傳喚程序的制度，至少延續到明代中葉。故今日「逮捕」意義的寬泛化，可能是很晚近的事。

關鍵詞：簡牘 逮捕 傳喚 名捕 亡命

---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文為科技部「秦漢吏卒階層發展研究」計畫(108-2410-H-001-004-MY3)階段性成果。

## 壹・前言

學界目前對秦漢簡中的「逕」有幾種不同的理解。第一種理解是在「逕」通「逮」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逕」有逮捕之意。如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指出「逕」與「逮」通用。<sup>1</sup>而張春龍、龍京沙進一步認定此字有逮捕之意。<sup>2</sup>《里耶秦簡牘校釋》亦認為「有逕，指有逮捕文書或被捕」。<sup>3</sup>第二種理解是指出「逕」有「及」的意思，可以衍生出「追究」之意。例如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早已引《方言》注此字：「及也。」認為有追究之意。<sup>4</sup>陳松長釋里耶秦簡 8-133 時認為，居延漢簡中確實有「逕書」，但未見單獨以「逕」字作為「逕書」使用的例子。且若將「逕」理解成「逕書」，則不好解釋 8-133 簡首的「或逕」，故贊同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認為「逕」字除逮捕外，也可作為追究之意。<sup>5</sup>第三項理解著眼於「逕」的實際操作，認為相當於傳喚之意。如宮宅潔便認為，應當受審訊者不在審判機構的轄區內，則由該機構傳喚本人；此種傳喚程序表現為「逕」，即「逮」。傳訊之際，並不直接派遣捕吏。<sup>6</sup>劉欣寧亦指出：「法庭傳喚被告或證人稱為『徵』或『逮』（字形常作『逕』）」，且「逮書」可作為拘捕的依據。<sup>7</sup>陳劍亦解為傳喚，並明言將「有逮」釋為「逮捕」不確。<sup>8</sup>

上述解釋中，陳松長並不排斥將「逕（逮）」解釋為逮捕。他在文中提到：「『逕書』二字一般一起出現，單獨使用多是逮捕、所逮捕之人的意思」，可見他並不反對將「逕」解釋成逮捕。只是認為當碰到「或逕」這類難以解釋成逮捕的用例時，應當同意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將「逕（逮）」解為「及」，延伸為「追究」之

<sup>1</sup> 彭浩等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368。

<sup>2</sup>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1：8-25。

<sup>3</sup>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第 1 卷，頁 71。

<sup>4</sup> 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 45, 126。

<sup>5</sup> 陳松長，〈《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校讀（八則）〉，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編，《簡牘學研究》第 4 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頁 21-26。

<sup>6</sup> 宮宅潔著，徐世虹譯，〈秦漢時期的審訊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見〉，楊一凡、寺田浩明、初山明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 287-322。

<sup>7</sup> 劉欣寧，〈秦漢訴訟中的言辭與書面證據〉，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 5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頁 339-371。

<sup>8</sup> 陳劍，〈讀秦漢簡札記三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518>，2011.06.04)。

意。故陳松長的意見與張春龍、龍京沙先生等並無矛盾，可視為一種補充。但宮宅潔、劉欣寧、陳劍將「逕（逮）」解為傳喚，無論是與張、龍所解之「逮捕」或陳松長補充的「追究」，都有無可避免的衝突。個人在考察後，認為無論是將「逕（逮）」解為「逮捕」或「傳喚」，都把握到了一部分的事實，也都還有未盡之處。以下謹陳述個人的淺見，就教於各方專家。

## 貳・「逕」、「逮」的通用及其與「逮捕」的關係

個人雖然不贊同將「逕（逮）」輕易等同「逮捕」的意見，但並不反對「逕」、「逮」通用的看法。相反地，我贊成這種看法，且認為二字的通用，最初可能是基於音近相通的關係。

當我初次拜讀到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指出「逕」與「逮」通用時，內心確實有所懷疑。因為在秦簡中「逕」與「逮」皆有，且寫法有明確差異。秦代人既能明辨「逕」與「逮」二字，不能排除使用上可能有區別。但考察里耶秦簡等史料後，不得不承認這兩字確實有通用的情況。以較常見的詞例「有逕（逮）」為例，頗有用「逮」字者，如里耶秦簡 8-135 提到「狼有逮在覆獄巴卒史衰、義所」，8-145+9-2294 亦提到「四人有逮」，<sup>9</sup> 9-25「五月遷陵令尉徹薄取，尉未有逮毆西陽，不薄」<sup>10</sup> 等。而同詞例中用「逕」字者亦常見，例如 8-136+8-144 載「有逕耐鼻以上」，8-905 提到「城旦瑣以三月乙酉有逕」，以及 8-1045 的「或逕遷陵獄」等。

必須要說明的是，為何我認定 8-1045 的「或逕」與「有逕」相通。陳松長已指出「或」置於簡首者，在睡虎地秦簡中也常見，都是釋為「有人」之意。<sup>11</sup>《里耶秦簡牘校釋（一）》亦注「或逕」曰：「『或』疑讀為『有』。」<sup>12</sup> 這種通用亦見於傳世古籍。《尚書·洪範》載：「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sup>13</sup> 此段在《呂氏春秋·貴公篇》被引述為：「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有」皆被改為「或」。對此

<sup>9</sup> 陳偉，《里耶秦簡牘校釋》第 1 卷，頁 72-73。

<sup>10</sup>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釋文頁 86。

<sup>11</sup> 陳松長，〈《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校讀（八則）〉，頁 22。

<sup>12</sup> 陳偉，《里耶秦簡牘校釋》第 1 卷，頁 71。

<sup>13</sup>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368。

高誘注曰：「或，有也。」<sup>14</sup>「或」與「有」的字形相去頗遠，其通用的原因不明。據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載「或」之上古音為“yûâk”、「（古）匣職」，<sup>15</sup>而「有」的上古音為“yîwə”、「（古）匣之」。<sup>16</sup>其聲母相同，韻母音也差不遠。似不能排除「或」、「有」古音相近而通用的可能。上述例子中，無論是「有逕」或「有逮」，描述的應該都是與獄案有關的同一種情況。這點從「有逮在覆獄巴卒史衰、義所」、「有逮毆西陽」，以及「有逕耐臯以上」、「或逕遷陵獄」等例證可以看出。

從里耶秦簡的例子看，「逕」與「逮」的通用是可信的，但為何字形不同的兩個字，使用上卻可以相通不別呢？竊疑可能與「或」、「有」的情況類似，也是古音相近的緣故。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記「逕」古音“dâp”、「（古）定緝」，<sup>17</sup>而「逮」的古音“dět”、「（古）定質」，<sup>18</sup>也是聲母相同的情況。恐怕在當時「逕」、「逮」的讀音很近，故在書寫時用「逕」或「逮」都不妨害理解。

「逕」既與「逮」通用，很自然地讓人聯想到這個字可能具有「逮」的意思。由於今日「逮」有時用為「逮捕」、「捉拿」之意，加上「逕（逮）」在諸簡文中常與獄案相連，故有張春龍、龍京沙先生判斷其為「逮捕」之意，實在情理之中。然而，從簡牘的用例看，「逕（逮）」無法輕易等同於「逮捕」。最明確的例子是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十八。該案的內容是調查攸令庫為何欲釋縱戰敗逃亡的新黔首。其中提到：攸縣在庫出任攸令前，為了平定利鄉的亂事，前後徵發了第三批新黔首。前面兩批都吃了敗仗，臨陣脫逃，按律令要治罪。但由於主管徵發的令史眡把第三批徵發者的名籍都放在同一個竹筍中，只有眡能分辨哪些是前兩批的當捕者。不巧令史眡也因為長官義戰死，擔心自己獲罪而逃亡。據獄史氏的供詞，攸縣為此曾經「逕眡，未來，未捕」，意即攸縣曾「逕（逮）」眡，可是他還沒來，而攸縣也還沒捕他。這可以證明「逕（逮）」與「捕」不是一件事。在本例中，「逕（逮）」如宮宅潔所言，並不直接派遣捕吏，只是將文書送到傳訊者的所在之地。其目的是讓被逮書傳訊者自行來官府報到，稱為「會逮」。<sup>19</sup>

<sup>14</sup> 高誘注，《呂氏春秋》（臺北：藝文印書館，2009），頁34。

<sup>15</sup>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頁44。

<sup>16</sup>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頁286。

<sup>17</sup>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頁6。

<sup>18</sup>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頁202。

<sup>19</sup> 宮宅潔，〈秦漢時期的審訊制度〉，頁297-298。

從《奏讞書》的例證可知，「逕（逮）」與「逮捕」不能輕易等同。可是我們在簡牘與文獻中確實看到有「逮捕」，也有根據「逮書」來捕人的例子。那麼這種「逮捕」究竟發生在何種情況下呢？劉欣寧推斷可能超過一定時限內未赴獄報到，才要加以「逮捕」，不失為一個合理的推斷；但我目前沒能找到稱拘捕未在時限內會逮者為「逮捕」的例證。就個人管見，還有一種可能是情節嚴重，擔心欲「逕（逮）」的對象脫逃或抵抗，從一開始就企圖採用「捕」的辦法來「逕（逮）」人，這種情況稱為「逮捕」。在文獻中有許多諸侯王犯法或謀反，從而為公卿奏請「逮捕」的例子，如青州刺史奏燕思王終古使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

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請逮捕。有詔削四縣。<sup>20</sup>又如廣川王去因王后昭信讒言，前後殺害所幸姬十四人，殺害後甚至支解烹煮。又遣奴殺害常諫正自己的老師及其子：

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sup>21</sup>

再如淮南王安謀反：

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sup>22</sup>

最後如衡山王賜謀反，為己子孝告發：

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sup>23</sup>

在上述諸侯王的例子中，雖然公卿請求逮捕，而皇帝往往基於宗室之情，或止削縣，或止逮捕其他關係人，或下令以即訊方式訊問。這種禮遇有時也見於大臣，例如趙廣漢為京兆尹：

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

<sup>20</sup> 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2），卷三八，〈高五王傳〉，頁987。

<sup>21</sup> 班固，《漢書補注》卷五三，〈景十三王傳〉，頁1139。

<sup>22</sup>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4），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頁1257。

<sup>23</sup> 司馬遷，《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頁1263。

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尉史禹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sup>24</sup>

無論是諸侯王或趙廣漢，原本都是由公卿或有司「請逮捕」。這是由於他們地位尊貴，必須要先請示皇帝，若皇帝同意才能逮捕。這點在《嶽麓書院藏秦簡（伍）》簡 J22 有明確規定：

• 令曰：治獄有選宦者、顯大夫若或告之而當徵捕者，勿擅徵捕，必具以其選告聞，有詔乃以詔從事。<sup>25</sup>

這條令規定，治獄遇到必須選宦者、顯大夫，或是有告劾應當徵捕他們的情況，不准擅自徵捕。必定要完具選的相關文件請示，有詔下達後才依詔辦理。可見在「選」時優遇特殊身分的規定並非漢所創制，而是承襲自秦。前引諸例無論是諸侯王或京兆尹趙廣漢，應當都是「顯大夫」以上的身分，故有司無法自行徵選，必須向上請示。

倘若應被「逮捕」者沒有前文所述的特殊身分，那麼官吏應該可以不經上請而「逮捕」。西北漢簡為我們揭露「逮捕」的部分實況。《懸泉漢簡釋粹》編號十七，簡號 I 0210(1):54 載：

獄所選（逮）一牒：河平四年四月癸未朔甲辰，效穀長增謂縣泉嗇夫、吏，書到，捕此牒人，毋令漏泄，先聞知。得，遣吏送……

其背面載：

/ 掾賞、獄史慶<sup>26</sup>

《懸泉漢簡釋粹》的注解認為這是一份通緝、追捕逃犯的牒書。現在看來，這恐怕不宜稱為通緝文書，而是「逮捕」文書。和一般的「選（逮）」稍不同處，在於一般的「選」是將「選書」送到所選對象所在的縣或單位後，由官吏告知本人到治獄處「會選（逮）」；可是本文件中，效穀長卻交代「捕此牒人」，且強調「毋令漏泄，先聞知」。效穀長的用意顯然是：要懸泉置官吏在不讓被「選」對象知曉自己被「選」的情況下拘捕之。後文還提到「得，遣吏送」，可見在捕獲後要由官吏押送。雖然下文殘斷，不能確知押送的目的地，但以理推之，應當要押到發出「選」請求之案件的治獄地點。這種基於「選（逮）」書交代，官吏以「捕」來達成「選

<sup>24</sup> 班固，《漢書補注》卷七六，〈趙尹韓張兩王傳〉，頁 1413。

<sup>25</sup>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伍）》（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頁 122。

<sup>26</sup> 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20。

（逮）」的辦法，就是「逮捕」。這樣的「逮捕」命令有可能是從遠方，甚至中央傳來。《懸泉漢簡釋粹》編號三一、簡號 II 0114(3):447 正面載：

黃龍元年四月壬申，給事廷尉史刑壽為詔獄，有逕（逮）捕弘農、河東、上黨、雲中、北地、安定、金城、張掖、酒泉、敦煌郡。為駕一封軺傳。外二百卅七。御史大夫萬年謂胃成，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

背面載：

護郡使者視事史治，承合檄詣郡，告治所。張掖縣得吏馬行。<sup>27</sup>

這份文件提到黃龍元年四月初一，因給事廷尉史刑壽治辦詔獄，有「逕（逮）捕」弘農、河東等十郡關係人的逕書。從背面「告治所張掖縣得吏馬行」來看，也許詔獄要「逕（逮）捕」的對象在縣得縣，因此這份文件也送往縣得縣。而且文件似乎要求縣得「承合檄詣郡」，合檄據《釋粹》引于豪亮之解釋，是一種只能由收件人拆封，不可傳閱的文書。<sup>28</sup> 這似乎可以呼應前引懸泉漢簡 I 0210(1):54 所提到的「毋令漏泄，先閱知」。據此，當治獄吏判斷應當採「逮捕」方式來「逕（逮）」人時，「逕書」可能是以密件方式傳遞到目標所在縣來執行。一個「逮捕」的實例見載於居延漢簡 193.19+58.17：

逕 戌卒縣得安成里王福字子文，敬以逕書捕得福盜械<sup>29</sup>

這枚簡首書「逕」字的文件，可能是交代「逕書」執行成果的記錄。內容提到「以逕書捕得」戌卒王福，並以刑具拘束之。雖然不知道王福是基於何種原因被「逮捕」，但很顯然他被「逕（逮）」的過程並不是由官吏告知後，自己前往「會逮」。「逕（逮）」他的文件可能如同前引懸泉漢簡 I 0210(1):54 那般，要求官吏在被「逕」者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逮捕」他。至於被「逕（逮）捕」者由捕獲的縣遣吏押送的實例，或可參居延漢簡 218.3，該殘簡提到：

□令史光敢言之，遣中部塢長始昌送詔獄所逕□

□□□□□<sup>30</sup>

這或許是某個候官在依令「逕（逮）捕」詔獄所逕對象後，派遣中部塢長始昌押送，要求過所河津關勿苛留的文件。詔獄是直屬朝廷的獄，不過不一定在首都。例如前引廣川王去一案便是由大鴻臚、丞相長史等雜治於鉅鹿詔獄，又《漢書·

<sup>27</sup> 胡平生、張德芳，《懸泉漢簡釋粹》，頁 36。

<sup>28</sup> 胡平生、張德芳，《懸泉漢簡釋粹》，頁 37。

<sup>29</sup> 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頁 188。

<sup>30</sup> 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頁 32。

## 高震寰

江充傳》提到江充上書武帝告發趙太子丹姦亂同產姊及趙王後宮、攻剽為姦等劣跡，「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sup>31</sup> 可見在魏郡也有詔獄。

目前沒有資料能明白顯示治獄吏是基於何種標準決定採取「逮捕」。從前引諸侯王所犯皆殺人、謀反等重罪，趙廣漢所涉亦為足以腰斬之重案來看，涉及重大犯罪很可能被「逮捕」。這大約是考量到目標知道自己涉入重案後可能會逃亡或反抗，故欲在目標猝不及防的狀況下強制拘捕到案。當然，除了重案外可能還有其他考量標準，且治獄吏本身的個性可能也會影響是否要「逮捕」涉案目標。

假若上述的論證沒有大錯，「逕（逮）」可包括兩種狀況。第一種接近宮宅潔、劉欣寧、陳劍所說的「傳訊」。其具體過程是由治獄吏發送「逕（逮）書」到欲「逕（逮）」對象所在的縣或主管單位；由縣或主管單位告知被「逕（逮）」者，由官吏遣送，或自行前往「會逕（逮）」。第二種是當牽涉重罪等情況，使治獄吏感到欲「逕（逮）」對象有逃亡或反抗可能時，就進行「逕（逮）捕」。具體流程也是由治獄吏發出「逕（逮）書」，但「逕（逮）書」是以密件形式傳遞到對象所在縣或主管單位。縣或主管單位拆封後，派遣捕吏「逕（逮）捕」指定目標，押送回治獄吏治所。如此看來，過去無論將「逕（逮）」解為「傳訊」或「逮捕」均有道理，但都不夠全面。實際情況是，根據治獄吏的判斷，會採取不同形式的「逕（逮）」法。「逮捕」確實是「逕（逮）」的一種形式，但不能說「逕（逮）」就是「逮捕」。至於拘捕收到「逕（逮）」之後未在時限內赴獄者，是否也稱為「逮捕」，還需要更多材料驗證。考量到秦漢「逮捕」之功能在於拘捕關係人以便偵查，功能接近今日之「拘提」程序。<sup>32</sup> 但由於制度背景不同，也不能將兩者完全等同。

## 參・「逕（逮）」的對象可能包括證物

歷來諸說談及「為了辦案徵召或拘捕人」的「逕（逮）」時，基本都以人為「逕（逮）」的對象，文獻與簡牘中的大部分案例也都是「逕（逮）」人；但是在部分簡牘資料中卻出現疑似「逕（逮）」文件的記錄，讓我懷疑「逕」的對象未必限於人。這個例子見於里耶秦簡 8-133，其正面載：

<sup>31</sup> 班固，《漢書補注》卷四五，〈蒯伍江息夫傳〉，頁 1048。

<sup>32</sup> 可參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第 76~77 以及 88-1 等條，中華民國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C0010001>，2019.07.04)。



或逕廿六年三月甲午遷陵司空受尉乘□

卒真簿□

廿七年八月甲戌朔壬辰酉陽具獄=史啟敢□□


啟治所獄留須敢言之·封遷陵丞□

背面載：

八月癸巳遷陵守丞陞告司空主聽書從事□

起行司空□

八月癸巳水下四刻走賢以來 / 行半。□<sup>33</sup>

簡文正面第一行下半，《里耶秦簡（壹）》與《里耶秦簡牘校釋（一）》釋為「遷陵司空得、尉乘」，將「得」、「乘」視為人名。然而觀圖版「得」字作「

我們知道「或逕」就是「有逕」，但後面接「廿六年三月甲午遷陵司空受尉乘……卒真簿」是什麼意思呢？我懷疑「有逕」後面接的是「逕」的對象，而在這個案例中，「逕」的對象不是人，而是「廿六年三月甲午遷陵司空受尉乘……卒真簿」這份文件。從後文可知道，這份文件是秦始皇廿七年八月十九日，由酉陽具獄獄史啟所發出，在廿七年八月二十日由遷陵守丞轉發給縣司空；故廿六年三月甲午應該不是這份文件的製作日期。從「獄留須」來看，可知啟所治獄案正等待某種東西才能繼續進行，那或許就是「廿六年三月甲午遷陵司空受尉乘……卒真簿」。

在《作徒簿》中常見「受司空城旦若干人」或「受倉隸臣若干人」的記錄，那是指文件製作者接受了來自司空或倉的城旦或隸臣若干人的意思。<sup>36</sup> 我認為本簡的「遷陵司空受尉」也是類似的句式，所以「或逕」的對象應當是：廿六年三月十

<sup>33</sup> 陳偉，《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70-71。

<sup>34</sup>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第1冊，頁558。

<sup>35</sup> 陳偉，《秦簡牘合集》第1冊，頁1321。

<sup>36</sup> 參高震寰，〈從《里耶秦簡（壹）》「作徒簿」管窺秦代刑徒制度〉，《出土文獻研究》第12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頁132-143。

三日，遷陵司空接受來自尉的……卒的真簿。「乘」應當不是尉的名，較可能與第二行連讀為「乘城卒」一類的身分。里耶秦簡 8-1452 曾經提到「案粟二石以稟乘城卒夷陵士五陽……」，可見在遷陵縣有乘城卒。如同城旦由司空主管，隸臣妾由倉主管一般，諸「卒」的主管機構是尉，這就是為何司空必須從尉接受卒，因為司空本身並不主管卒。當司空接受卒後，理應要書寫類似《作徒簿》的記錄，交代這些卒的名字，以及為他們安排了何種工作，那可能就是具獄獄史啟希望調查的內容。文件是由司空書寫並保存，所以遷陵縣收到獄史啟的請求後轉發給司空，要求「聽書從事」。獄史啟特別強調「真簿」，指定要求那天的原始記錄，應是為了確保調查的準確性。

假若上述對 8-133 的解讀可以成立，那麼秦漢時期「逕（逮）」的對象雖然大多數是人，但必要時也可以徵召文件。「逕（逮）」作為秦漢法律文書的用語，應如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所引《方言》注此字，有「及」的意思；但恐怕不能解為「追究」，而是取「連及」之意與制度結合，指該人或該文件與本案有所牽連，為此要徵其到案。不論是通知本人會逮，或逮捕，又或如本節所言徵引諸文件，都是徵引獄案所連及之人或物到案的手段而已。無論是哪一種手段都不能完全代表「逕（逮）」的全貌。必須坦承，「逕（逮）」文件或物品的例證，目前只有里耶秦簡 8-133 的孤證。一如本節標題所示，只是一種可能。這個假說的成立與否，有待進一步的史料與各方專家的檢證。

應當補充，並不是所有秦漢簡牘中的「逕（逮）」都指「為了辦案徵召或拘捕人」的程序。例如《嶽麓書院藏秦簡（參）》案例三與案例十二中「逕戊午赦」與「逕己巳赦」。整理者指出「逕」有「及」之意，理解為「遇上（赦令）」。<sup>37</sup> 則此處的「逕」並非徵召或徵引赦令，只是遇上赦令之意。還有一種「逕」文書的用例，見於嶽麓秦簡與里耶秦簡中稱為「相逕」的辦法。吳雪飛已指出，所謂「相逕」又稱「同事相逕」，是將同類或同一事而有關聯性的犯罪，合併視為一罪處理。「累論」則與之相反，指積累論罪，即每一行為算一罪並判一刑。並引用嶽麓秦簡及里耶秦簡的例證，指出「相逕」與「累論」可能不是秦代罪數問題普遍適用的原則，而僅應用在官吏的行政過失的量刑方面。<sup>38</sup> 考慮到「累論」是與論罪相關

<sup>37</sup>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頁 124，211。又審查人指出「逕某赦令」即「會某赦令」，「逕」與「會」同義。

<sup>38</sup> 吳雪飛，〈說里耶秦簡（貳）中的「相逕」〉，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109](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109)，2018.05.17)。

的概念，與之相對的「相逕」很可能也是論罪相關的概念。<sup>39</sup> 上述兩種詞彙雖然也取「逕（逮）」原義的一部分，形成某種格式或術語。但基於不同文書脈絡與制度，具體內容與操作方式和「為了辦案徵召或拘捕人」的「逕（逮）」有所不同。

## 肆・「逕（逮）」的使用限制

如前所述，「逕（逮）」是官吏治獄時，用來徵求與案件相關的嫌疑犯或證人、文件到案的一種手段。可是「逕（逮）」有不小的後遺症，逕人是一件傷害極大的事，不只被逕者可能因收繫而導致身體、財物損失，官吏也必須為逮捕、遣送等繁瑣程序付出不小的行政成本。而且一個案子往往不止「逕（逮）」一人，有些重案往往連及數百人。《史記·酷吏列傳》便提到杜周為廷尉時：

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sup>40</sup>

假如是涉及謀反的案子，牽連被逮者更可達數千以上。例如《漢書·王莽傳》提到新莽地皇元年：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為輔國侯。<sup>41</sup>

大規模的「逕（逮）」不只可能牽連無辜、造成行政負擔，就漢代人來看，還可能導致陰陽不調，傷及和氣。東漢順帝時，中常侍張逵等共譖外戚梁商與中常侍曹騰、孟賁欲圖廢立，請收捕之。但此舉為順帝戳破，直言張逵等是因為嫉妒而毀謗。張逵等恐懼，竟矯詔收縛曹騰、孟賁。順帝聞知後大怒，急收捕張逵等，皆誅之，而其供詞染及在位大臣。梁商擔心大獄將興，於是上疏請求盡速結案，其奏文便提到：「竊聞考中常侍張逵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眾，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可見當時也明白諸多被「逕（逮）」者中有很多是無辜牽連的，而且久繫的死囚為了免於刑求或脫罪，很可能隨意誣陷他人。這將導致官吏要費盡心力去逮捕更多無辜者。

<sup>39</sup> 此承審查人指出。

<sup>40</sup> 司馬遷，《史記》卷一二二，〈酷吏列傳〉，頁1287。

<sup>41</sup> 班固，《漢書補注》卷九九，〈王莽傳下〉，頁1749。

面對「選（逮）」可能對受選者產生的傷害，以及對行政系統的衝擊，秦漢時期似已有一些法規來限制「選（逮）」的使用。第一項限制便是前節所指出，若遇到需要徵選宦者、顯大夫以上身分的情況，必須先上請，依詔行事，不得擅自徵選。從文獻看，皇帝對於諸侯王或高階官吏有可能給予「即訊」的優遇。前節已述，此處恕不贅引。

第二項限制則是罪輕者不選。居延漢簡 157.13+185.11 載：

律曰：贖以下可檄=勿徵選，頃令史移檄寫[憲]功算臬纏蒲封<sup>42</sup>

本簡可能是某文件開頭的一部分，其所引的律曰提到：「贖以下可檄，檄，勿徵選。」下文中的「頃」，雖然就字形上看確實是「頃」字，但就文義來說釋「願」比較通。我們知道漢簡中「頃」與「願」的草寫非常近似，故可能雖然寫了「頃」而實際上要表達「願」的意思。而「令史」雖然是縣中常見的官名，但從里耶秦簡來看，「令史」一詞在文件中不一定指官名，而可能是對該縣負責人的一種敬稱。例如里耶秦簡 9-470 便有「……陽守丞□敢告遷陵丞主：令史可以律令從事」，這支簡開頭的「陽守丞」應當是「西陽」之類的縣名，這個「某陽守丞」移書給「遷陵丞主」的內容就是「令史可以律令從事」。<sup>43</sup> 里耶秦簡 9-2287 西陽縣令齮給遷陵縣的移文中，亦提到「令史可以書到時定名吏里亡年月它坐論報赦臬云何」，後文西陽守丞宜催遷陵縣回報時也說：「敢告遷陵丞主，未報，追，令史可為報，勿留。敢告主。」<sup>44</sup> 看來兩縣之間互相移書時，習慣以「令史」作為敬稱。這種稱法與王充提到的「兩郡移書，曰『敢告卒人』」<sup>45</sup> 大概是類似習慣，只不過二千石相移書用「卒人」，而兩縣用「令史」。居延漢簡 157.13+185.11 的「令史」應當也是這樣的產物；由此推測，這大約是某個縣級單位移書給另一個縣級單位的文件。「頃（願）令史移檄寫[憲]功算臬纏蒲封」，就是以令史敬稱對方，要求對方以「檄」的方式抄寫憲的功算，用臬麻纏繞蒲封的意思。所謂「檄」具體究竟如何操作，從中看不清楚，如果與前引里耶秦簡 8-133「選（逮）」要求「真簿」對比，其與「選（逮）」的差異之一可能在於「檄」不需要正本。可以想見，倘若是調查正本，在獄案結束後恐怕還要差人送回原單位。大約贖以下都是罰款的輕罪，不值得浪費人力物力與時間去「選（逮）」。

<sup>42</sup> 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貳）》（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 138。

<sup>43</sup>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貳）》，釋文頁 21。

<sup>44</sup>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貳）》，釋文頁 85-86。

<sup>45</sup> 漢·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一二，〈謝短〉，頁 572。

第三項限制是，有其它重罪逮繫於它縣道官者不逕。居延新簡 E.P.S.4.T2:101 載：

移人在所縣道官，縣道官獄訊以報之，勿徵逕，徵逕<sup>46</sup>者，以擅移獄論<sup>47</sup>

劉欣寧曾引本簡，並推測可能是被告或證人遠離負責審理之獄時的處置規範。<sup>48</sup>但從里耶秦簡來看，這也可能是當事人有它案在身，不便遣送的情況。里耶秦簡 8-136+8-144 正面載：

□□[月]己亥朔辛丑，倉守敬敢言之：令下覆獄[逕]遷陵隸臣鄧

□□□名吏(事)、它坐，遣言。・問之，有名吏(事)，定：故旬陽隸臣，以約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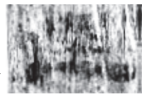
□□□史有逕耐臯以上，毆遷陵，未央(決)，<sup>49</sup>毋遣毆。謁報覆獄治所。敢言


其背面載：

□[刻刻]下六，小史夷吾以來 / 朝半

尚手<sup>50</sup>

本簡從內容推敲，疑似是有某地的覆獄吏因查案需要，要求遷陵縣「逕（逮）」隸臣鄧；遷陵縣於是詢問主管隸臣資料的倉，才有倉守敬以本簡作為答覆，並請遷陵縣轉呈覆獄治所。最後提到的「毋遣毆」的「遣」，《里耶秦簡牘校釋（一）》疑「遣」通「譴」，指罪過。<sup>51</sup>這說法可備一說，但個人更傾向劉欣寧的解法。劉欣寧引居延簡 49.19：「・右効逕遣書」指出効、逮、遣應是連續的三個階段，各自有其文書。就本簡來說，覆獄所「逕」的隸臣鄧，若無意外，或許要被遷陵縣「遣」到覆獄治所「會逮」。但他似乎觸犯某種罪行，被拘繫在遷陵縣，且尚未論決。這很可能是一種依法不便「遣」的狀況，恐怕符合居延新簡 E.P.S.4.T2:101 所說：「移人在所縣道官，縣道官獄訊以報之」的條件。所以遷陵倉只好回報：「毋遣毆。」從遷陵倉所特別強調鄧「有逕耐臯以上」來看，限制「逕（逮）」的標準大約就是：當被徵逕者在先前已經因耐罪以上的罪行被他縣道官「逕（逮）」繫，那麼



<sup>46</sup> 《居延新簡集釋》釋「逮」。該字作「」，雖稍嫌模糊，但上部似為「四」形，與上一個「逕」字相近，我認為還是「逕」的機率大些。

<sup>47</sup> 張德芳主編，《居延新簡集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第7冊，頁383。

<sup>48</sup> 劉欣寧，〈秦漢訴訟中的言辭與書面證據〉，頁359-360。

<sup>49</sup> 參陳偉，〈里耶秦簡中的「央」〉，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16](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16)，2013.09.26)；又見朱漢民、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參）》，頁99，109註31。

<sup>50</sup> 陳偉，《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76。

<sup>51</sup> 陳偉，《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頁76-77。

後選的縣道官就不許選他，必須委請該人所在的縣道官錄口供，再傳回該獄案的治所。假若對方明知鄧不該被遣送，還要強行徵選，那就「以擅移獄論」。

第四項限制是，當吏坐官事論罪者，不選已經免官、徙官者。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效律》簡 350 載：「吏坐官當論者，毋選免、徙。」彭浩主編《二年律令》將「選」解為及，並從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中整理小組的解釋，認為是「追究」之意。<sup>52</sup> 若果真是「追究」之意，那就變成因坐官事當論罪者，只要免官、徙官就不追究。根據前文所論證的「選（逮）」之內容，我認為並非都不追究，而只是不用「選」的方式將免、徙者召回來而已。這條律列在〈效律〉，可能也是有用意的。《二年律令·效律》大多是官府財產的交代或核驗的規定，例如簡 351 提到「效案官及縣料而不備者，負之」，簡 352 提到「出實多於律程，及不宜出而出，皆負之」，都是規定官吏因過失導致政府財產上的損失時，必須負責賠償。倘若簡 350 所謂的「坐官當論者」是指這類過失，那麼就不值得大費周章地將已免、徙者從遠方選來。這不一定代表政府就不追究免、徙者的賠償責任。政府即便不「選（逮）」，依然可以用文書傳遞的方式向過失者追債，我們在里耶秦簡看到許多向戍卒追債的文書，也許相同的辦法也能套用在小吏身上。或者如居延漢簡 157.13 + 185.11 所說，用「檄」的方式。又或者採用前段所論「移人在所縣道官，縣道官獄訊以報之」的方式。要之，選不選不一定能等同追不追究。

另一條涉及選「免、徙」者的規定，見於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簡 143 載：「灋（廢）令、犯令，選免、徙不選？選之。」<sup>53</sup> 這也正是彭浩等先生將「選」解為「追究」的根據。假若從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的解釋解為「追究」，並與《二年律令·效律》的規定對比，可能會得到「秦代時還追究免、徙者，而漢初已經不追究免、徙者」的結論。但如果從本文所論，「選」是一種徵求疑犯或證人、文件到案的手段，而非「追究」的意思。所以這兩條的差別恐怕在於要不要使用「選」來追究，而非追不追究。又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問的是「灋（廢）令、犯令」的情況，可能也與《二年律令·效律》「吏坐官當論者」的前提有所差別。例如《嶽麓書院藏秦簡（參）》案例六提到「暨坐八劾：小犯令二，大誤一，坐官小誤五」，將官吏「小犯令」與「坐官小誤」的過失區別並列。<sup>54</sup> 故單就這兩條材料

<sup>52</sup> 彭浩等，《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頁 229。

<sup>53</sup> 陳偉，《秦簡牘合集》第 1 冊，頁 253。

<sup>54</sup> 朱漢民、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參）》，頁 148。

來看，還無法判斷秦末與漢初對「逕免、徙」的相關規定有無變化。也可能是兩條並行不悖，甚至互相補充的規定。

## 伍・秦漢「逕（逮）捕」與今日「逮捕」的差異——兼論「亡命」

前文所提到秦漢時期的「逕（逮）捕」，和今日也常使用的「逮捕」一詞，是否有某種關係呢？我的看法是，今日使用的「逮捕」一詞確實源自秦漢的「逕（逮）捕」；但由於制度的變化，使該詞脫離了原有制度之脈絡。

### 一・今日各國之「逮捕」

讀者或許會質疑，本文作為秦漢歷史研究，是否有必要牽涉今日的制度。本文的理由是，文中所論秦漢的「逕（逮）捕」，與今日常詞「逮捕」在用法上有類似處，易生混淆。且基於各國法律對「逮捕」定義不同，可能導致各國學者在討論時有人採普遍意義，有人採法律定義，或各自採用本國的法律定義；如此雖然使用同一詞彙，實際上有無法溝通的危險。因此有必要先辨明現代的概念工具。此外，透過古今的對比，也能凸顯秦漢「逕（逮）捕」的時代特色。

必須聲明，本文雖引用各國法條，但僅聚焦在詞彙的使用方式，不討論制度優劣。且由於法令經常修改，以下所論今日各國法令之「逮捕」，只能反映本文所引用法典或法律論著出版時期，或所閱覽法令網站當下的使用情況。<sup>55</sup> 且為了閱讀上的便利，只引用法條中與本文相關部分。祈請讀者留意。以下擬就今日在法律上仍使用或部分使用漢字，並對秦漢史有較多研究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之「逮捕」，與秦漢之「逕（逮）捕」作一初步比較。

#### （一）中華民國的「逮捕」

中華民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對「逮捕」的定義是：「對於現行犯、準現行犯或通緝犯加以緝拿，並拘束其身體自由，而行偵查或處罰。」<sup>56</sup> 此一解釋

<sup>55</sup> 由於各國法令修改頻繁，為確保所引法條內容不致太過時，本文引用各國法令，均以各國政府網站在寫作當下公布之法令為準。

<sup>56</sup> 國家教育研究院維護，《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t/gswweb.cgi?ccd=xsVJIh&o=e0&sec=sec1&op=v&view=0-1>，2019.07.04)。

高震寰

在中華民國法律中確實有對應法條。〈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七條提到：

通緝經通知或布告後。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得拘提被告或逕行逮捕之。<sup>57</sup>

而〈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八條載：

現行犯，不問何人得逕行逮捕之……

顯示今日拘捕通緝犯、現行犯，在法律上都可稱作「逮捕」。需要稍加解釋的是，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在解釋「逮捕」的範圍時，並未包括嫌疑犯，可是法條中亦見「逮捕」嫌疑犯的用例。〈中華民國憲法〉第八條提到：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sup>58</sup>

但必須注意，據大法官第三九二號解釋，中華民國憲法中的「逮捕」之意義，較〈刑事訴訟法〉中的「逮捕」更寬泛。王兆鵬指出，大法官第三九二號曾解釋憲法第八條之逮捕：「係指以強制力將人之身體自由予以拘束之意。」故雖然在〈刑事訴訟法〉中，「拘提」指需要拘票之人身自由拘束，而「逮捕」指不需要拘票之人身自由拘束；但只要以強制力拘束人之身體自由，即構成憲法之「逮捕」。<sup>59</sup> 似乎可以認為，在〈刑事訴訟法〉這類涉及具體程序操作的法規中，「拘提」是有拘票的拘捕程序，「逮捕」則指無令狀的拘捕程序；然這兩種拘捕程序基於強制拘束人身自由的特點，都可以視為廣義的「逮捕」，也就是〈中華民國憲法〉的用法。《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可能採用〈刑事訴訟法〉「無令狀之拘捕」之解釋，因此未將嫌疑犯納入「逮捕」範圍。但從大法官解釋可知，普遍意義上，凡以強制力拘束人身自由皆可稱為「逮捕」。

綜合上述，中華民國法律意義的「逮捕」主要相對於有令狀的「拘提」，指無令狀之拘捕。但在憲法中的「逮捕」採普遍意義，泛指強制拘束人身自由的行為。

##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逮捕」

中華人民共和國「逮捕」的普遍意義也相當寬泛，惟在法律上只適用於有「逮

<sup>57</sup> 中華民國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刑事訴訟法〉，修正日期：民國 108 年 06 月 19 日。最後生效日期：民國 108 年 12 月 19 日。本法 108.06.19 修正之第 33、404、416 條條文及增訂之第 93-2～93-6 條條文及第八章之一章名，自修正公布後六個月施行。（<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C0010001>，讀取 2019.07.04）。以下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皆引自該處，不另外註引。

<sup>58</sup> 中華民國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中華民國憲法〉，公布日期：民國 36 年 01 月 01 日。（<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00001>，讀取 2019.07.04）。

<sup>59</sup> 王兆鵬，〈論拘提或逮捕相關問題〉，《日新半年刊》3（2004）：8-21。



捕證」的拘捕程序。《漢語大詞典》「逮捕」的第一義解釋是：「捕捉、捉拿」。不過第二義便指出法律上的「逮捕」是「今法律上稱限制人犯人身自由并予以羈押的一種強制措施」。<sup>60</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意義的「逮捕」，與中華民國主要針對通緝犯與現行犯相反，僅用於稱述拘捕嫌疑犯。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八十條載：

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須經過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決定，由公安機關執行。<sup>61</sup>

再根據其〈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提到：

逮捕後，應當立即將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羈押。

可見如同《漢語大詞典》所言，其法律「逮捕」程序包括隨後的羈押。在一般逮捕程序外，還有一種「附條件逮捕」。也就是人民檢察院對證據尚未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但所證明的事實已經構成犯罪，認為經進一步偵查能取得定罪所需的證據，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嫌疑犯，應批准逮捕。如果在偵查羈押期限屆滿前仍不能取得定罪所需充足證據，則撤銷逮捕。<sup>62</sup> 無論是一般逮捕或「附條件逮捕」，都是針對嫌疑犯，且需要特定機關批准逮捕證的拘捕程序。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現行犯的拘捕在法條上稱為「拘留」或「扭送」，與「逮捕」是不同程序。對現行犯的「拘留」見其〈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二條：

公安機關對於現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

「扭送」現行犯見其〈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四條：

對於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處理……

「扭送」只是指將人犯拘捕至公安機關的行為。被公民「扭送」的人犯，可能經公安機關辦理「拘留」後，進入「拘留」狀態。公安「拘留」時必須出示「拘留證」。「拘留證」由縣級以上公安機關批准即可。若情況緊急來不及辦理拘留手

<sup>60</sup> 《漢語大詞典》編委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3，第2刷），第10卷，頁1013。

<sup>61</sup> 中國人大網，權威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根據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三次修正。（[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11/05/content\\_2065631.htm](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11/05/content_2065631.htm)，讀取2019.07.03）。以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法條皆引自該處，不另外註引。

<sup>62</sup> 朱孝清，〈論附條件逮捕〉，《中國刑事法雜誌》2010.9：3-10。

續，也可以將嫌犯帶到公安機關後辦理。<sup>63</sup> 如果要「逮捕」被「拘留」的人犯，必須要進一步申請。其〈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一條提到：

公安機關對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應在拘留後的3日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審查批准。

其法律「拘留」與「逮捕」的差異在於，「拘留」只在緊急情況下臨時且短期拘束人犯，必須在時限內訊問或找到證據才能「逮捕」。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條對於通緝犯的拘捕亦不稱「逮捕」。其〈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提到：

應當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機關可以發布通緝令，採取有效措施，追捕歸案。

雖然「應當逮捕」是通緝的前置條件，不過在其法條上未見「逮捕」通緝犯的用例。考慮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逮捕」需要被特定機關批准的逮捕證，敘述拘捕通緝犯不使用「逮捕」可能是出自刻意。故總結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上的「逮捕」定義較中華民國狹窄。專指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決定，由公安機關以逮捕證拘捕嫌疑犯，並立即羈押的措施。

### （三）日本的「逮捕」

日本的「逮捕」與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有普遍意義與法律定義兩種。《広辞苑》對「たい-ほ【逮捕】」的解釋是：

① 人の身体に直接に力を加えて、その行動の自由を奪うこと。めしとること。

② 刑法上は、人の行動の自由を拘束すること。刑事訴訟法上は、捜査機関が裁判官の発する令状（逮捕状）により被疑者を引致し、短期間抑留するための強制手段。現行犯人は、逮捕状なしに誰でも逮捕できる。<sup>64</sup>

第一條解釋奪取人身自由，末一句的「めしとる」，根據同書「めし-と・る【召し捕る】」條的解釋是：「官命によつて罪人を捕らえる。『賊を一・る』」。<sup>65</sup> 結合前句，應可理解為：拘束官命罪人自由之意。第二條解釋則著重在日本當前法律

<sup>63</sup>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編，《行政法律規章司法解釋全書》（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第一百零六條，頁2-54～2-55。

<sup>64</sup> 新村出編，《広辞苑》（東京：岩波書店，2018，第7版第1刷），頁1765-1766。

<sup>65</sup> 新村出，《広辞苑》，頁2883。

上「逮捕」的定義。指出在〈刑法〉上是拘束人身自由；而在〈刑事訴訟法〉則是必須由搜查機關的裁判官發下逮捕狀，強制嫌疑犯到官署，短期拘留的手段。但也補充，如果是現行犯就不需要逮捕狀，任何人皆可逮捕。

《広辞苑》對日本法律上「逮捕」的定義，在日本〈刑法〉<sup>66</sup> 與〈刑事訴訟法〉<sup>67</sup> 中都可以找到對應法條。其〈刑法〉中的「逮捕」主要出現在懲處不法逮捕之規定，例如第二百二十條：

不法に人を逮捕し、又は監禁した者は、三月以上七年以下の懲役に処する。考慮到法條是針對非法逮捕，理應也包括無逮捕狀的非法人身拘束。故《広辞苑》謹慎地將其〈刑法〉的「逮捕」與〈刑事訴訟法〉程序上的「逮捕」區別有其道理。至於其〈刑事訴訟法〉中的「逮捕」，常指專門的法定程序。大致可分為：通常逮捕、緊急逮捕、現行犯逮捕。<sup>68</sup> 通常逮捕即依法官簽發令狀實施的逮捕。據其〈刑事訴訟法〉第百九十九條提到：

検察官、検察事務官又は司法警察職員は、被疑者が罪を犯したことを疑うに足りる相当な理由があるときは、裁判官のあらかじめ発する逮捕状により、これを逮捕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當檢察官與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有相當理由足以懷疑被疑人已犯罪，由裁判官事先發下逮捕狀，乃可以執行逮捕。只有在某些情況下允許緊急逮捕，據第二百十條載：

検察官、検察事務官又は司法警察職員は、死刑又は無期若しくは長期三年以上の懲役にあたる罪を犯したことを疑うに足りる充分な理由がある場合で、急速を要し、裁判官の逮捕状を求め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きは、その理由を告げて被疑者を逮捕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sup>66</sup> 日本〈刑法〉，施行日：平成二十九年七月十三日，最終更新：平成三十年七月十三日公布（平成三十年法律第七十二号）改正，日本 E-GOV 電子政府の総合窓口 ([https://elaws.e-gov.go.jp/search/elawsSearch/elaws\\_search/lsg0500/detail?lawId=140AC0000000045](https://elaws.e-gov.go.jp/search/elawsSearch/elaws_search/lsg0500/detail?lawId=140AC0000000045)，讀取 2019.07.02)。以下日本〈刑法〉法條皆引自該處，不另外註引。

<sup>67</sup> 日本〈刑事訴訟法〉，施行日：令和元年六月二日，最終更新：平成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公布（平成二十九年法律第七十二号）改正，日本 E-GOV 電子政府の総合窓口 ([https://elaws.e-gov.go.jp/search/elawsSearch/elaws\\_search/lsg0500/detail?lawId=323AC0000000131](https://elaws.e-gov.go.jp/search/elawsSearch/elaws_search/lsg0500/detail?lawId=323AC0000000131)，讀取 2019.07.02)。以下日本〈刑事訴訟法〉法條皆引自該處，不另外註引。

<sup>68</sup> 宋英輝譯，《日本刑事訴訟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頁 5-6。

當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職員，有充分理由足以懷疑被疑人犯有死刑或無期，或3年以上的懲役刑或禁錮之罪時，由於情況緊急，來不及請求裁判官簽發逮捕狀，可以在告知理由後逮捕被疑人。緊急逮捕後，必須立即請求裁判官簽發逮捕狀。如果不簽發時，應立即釋放。過程大致與中華民國的「逕行拘提」類似。至於現行犯的「逮捕」，見於其〈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三條：

現行犯人は、何人でも、逮捕状なくしてこれを逮捕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法條明確規定，任何人都可以在沒有逮捕狀的情況下「逮捕」現行犯。可以看到，日本的通常逮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需要法律憑證。但緊急逮捕與現行犯逮捕的法條在敘述「逮捕」人犯的當下沒有逮捕狀，只能解釋為普遍意義的「逮捕」。日本法律在使用「逮捕」一詞時，未必都指有逮捕狀的拘捕，在其〈刑法〉、〈刑事訴訟法〉都能見到採廣義「人身拘束」的用例。

以上簡單介紹了今日三國「逮捕」的普遍與法律定義。可以看到各國在「逮捕」的普遍意義上比較一致，都強調官方拘捕人犯，以及人身拘束的脈絡。法律意義上，中華民國與日本的部分法條，雖然基於各自的制度對「逮捕」有比較狹窄的定義；但在其他法條中有時又採取最廣義的「人身拘束」。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法條在敘述拘捕現行犯與通緝犯時都迴避使用「逮捕」一詞；因此就其法條，可以嚴格將「逮捕」定義為：根據逮捕證拘捕並羈押嫌疑犯的程序。

## 二・秦漢對拘捕現行犯與通緝犯的敘述

回到秦漢的制度。前文已經提到，秦漢的「逕（逮）捕」只是「逕（逮）」的一種手段。「逕（逮）」只有在治獄吏判斷某人或某文件與本案有牽連，值得將該人或該文件強制徵召至斷案處訊問、調查時才使用。而「逕（逮）捕」專指以「逕（逮）」書拘捕指定對象的行為。這與今日中華民國與日本法條可以「逮捕」敘述拘捕現行犯或通緝犯很不一樣。如同日本學者宮宅潔所言，還沒有發現秦漢「逕（逮）捕」現行犯的例子。<sup>69</sup> 不僅如此，就連「逕（逮）捕」通緝犯的例子也沒有見到。那麼，秦漢時期對拘捕今日定義的現行犯與通緝犯時，又是如何表述呢？為了與今日制度作比較，並凸顯「逕（逮）捕」在秦漢司法流程中的特殊性，以下謹略論秦漢時期敘述拘捕現行犯與通緝犯的情況，以明其與「逕（逮）捕」的差異。

---

<sup>69</sup> 宮宅潔，〈秦漢時期的審訊制度〉，頁296。

### （一）敘述拘捕現行犯的情況

秦漢時期拘捕現行犯，一般僅單以「捕」字稱述，不稱「逮捕」。例如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簡 10 載：

甲盜不盈一錢，行乙室，乙弗覺，問乙論可（何）毆（也）？毋論。其見智（知）之而弗捕，當貲一盾。<sup>70</sup>

這段話提到甲盜不盈一錢，經過乙的居室，若乙沒發覺的話不用論罪。但如果看到且知道甲盜錢卻不捕，那就當貲一盾。就本段假設乙「見智（知）」的場合而言，當乙看到甲時，甲還是現行犯，這種情況下應當要「捕」。若「弗捕」，要罰錢。又如睡虎地秦簡《封診式》奸條：

奸 爰書：某里士五（伍）甲詣男子乙、女子丙，告曰：「乙、丙相與奸，自晝見某所，捕校上來詣之。」<sup>71</sup>

在這個假設的例證中，甲目擊到乙、丙相奸，並當場抓獲他們。當場拘捕他們的行為也稱為「捕」。但由於是抓奸，所以還要加上「校上」。<sup>72</sup> 文獻中記載漢代拘捕現行犯也是單用「捕」字而未見用「逕（逮）捕」者，例如《漢書·樂布傳》：

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sup>73</sup>

漢朝以謀反名義夷彭越三族後，梟其首於雒陽以示眾，並下詔有收視者就拘捕。樂布本為彭越出使齊國，歸還後不但在彭越頭下奏事，還祠而哭之，無疑是現行犯。於是吏「捕」之以聞。又《漢書·張釋之傳》記：

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sup>74</sup>

這段知名的情節敘述：文帝出行至中渭橋時，有一人從橋下跑過而驚嚇到乘輿馬。於是遣騎「捕」這名現行犯，交付給廷尉治罪。最後，一個能凸顯「捕」與「逮捕」差異的記載見於《二年律令·捕律》簡 152：

<sup>70</sup> 陳偉，《秦簡牘合集》第 1 冊，頁 199。

<sup>71</sup> 陳偉，《秦簡牘合集》第 1 冊，頁 318。

<sup>72</sup> 邢義田，〈秦或西漢初和姦案中所見的親屬倫理關係——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奏讞書》簡 180-196 考論〉，氏著，《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489-539。

<sup>73</sup> 班固，《漢書補注》卷三七，〈季布樂布田叔傳〉，頁 981。

<sup>74</sup> 班固，《漢書補注》卷五〇，〈張馮汲鄭傳〉，頁 1096。

捕盜賊、罪人，及以告、劾逮捕人，所捕格鬪而殺傷之，及窮之而自殺也，殺傷者除，其當購賞者，半購賞之。殺傷<sup>75</sup>

這條規定的開頭用「及」字區分了兩種情況：「捕盜賊、罪人」與「以告、劾逮捕人」，這兩種情形都符合後文「所捕格鬪而殺傷之，及窮之而自殺也，殺傷者除」的規定。前面一種情況中，捕「盜賊」大約包括正在偷盜的現行犯，而「罪人」似乎罪名已定，或許包括通緝犯。後一種情況則提到「逮捕」是基於「告、劾」，也就是有人告發或舉劾。之所以要強調兩種情況都適用，恐怕是因為基於告、劬「逮捕」的對象只是嫌疑犯或證人。由於還不確定對方是否有罪，官吏可能會遲疑是否能像「捕」現行犯那般，不惜殺傷對方來完成「逮捕」。對此，律令給出肯定的答案，鼓勵官吏放手行使武力來完成任務。

## （二）敘述拘捕通緝犯的情況

### 1. 「詔所名捕」

秦漢時期敘述追捕通緝犯，除了單用「捕」字外，有一類情節嚴重的追捕稱為「名捕」而非「逕（逮）捕」。例如居延新簡 E.P.T5:16：

朔乙酉萬歲候長宗敢言之，官下名捕詔書曰：□□不知何七男子共賊燔男子李強盜兵馬，及不知何男子凡六十九人點謀更相□□怨攻盜賊燔人舍攻亭<sup>76</sup>

本簡應是萬歲候長對候官的報告。簡文首先提到候官曾下達一份「名捕詔書」，其內容提到「不知何七男子」共同賊燔了某李姓男子的某種東西，又強盜兵馬，以及「不知何男子凡六十九人」似乎也做了殺人放火的勾當。「不知何男子」顯示朝廷還不確定他們的身分，但由於所犯情節重大，特下詔書名捕。各單位在收到這類「名捕」詔書後，必須積極搜索轄區內可疑處，並回報結果，如居延漢簡 179.9 載：

匿界中，書到，遣都吏與縣令以下逐捕搜索部界中疑亡人所隱匿處，以必得為故。詔所名捕重事，=當奏聞，毋留，如詔書律令。<sup>77</sup>

這段殘文要求「書到，遣都吏與縣令以下」都要搜索轄區可疑場所。基於能遣「都吏」者多為二千石官，本簡內容既能命令二千石官遣都吏，應是自丞相、御史大夫

<sup>75</sup> 彭浩等，《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頁 151。

<sup>76</sup> 張德芳，《居延新簡集釋》第 1 冊，頁 146。

<sup>77</sup> 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貳）》，頁 198。

層級的中央機構發出。「以必得為故」的用法當類似吳王濞指控黽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為故」。如師古注曰：「言專以侵辱諸侯為事業。」<sup>78</sup> 同理，「以必得為故」就是專以此必定要捕獲的追捕為事業。本簡最後還交代「詔所名捕」是「重事」，相關事務必須要上奏，不得留遲。至於「詔所名捕」的實際內容，或可參居延漢簡 183.13：

（第一欄）

詔所名捕平陵長雀里男子杜光字長孫，故南陽杜[衍]

為人黑色，肥大，頭少髮，年可卅七、八，長[七]尺四、五寸□□□楊伯

初亡時駕驄牡馬，乘闌輦車，黃韋茵，伏白□□騎驄牡馬

（第二欄）

皆坐役使流亡，屯戶百卅三，擅置田監

史□法不道。丞相、御史□執金吾□<sup>79</sup> 屬

所二千石來捕<sup>80</sup>

本簡說明了「詔所名捕」的男子杜光之外貌，以及逃亡時乘坐的車馬特徵。第二欄則註明其罪狀。從第二欄的「皆坐」來看，被「名捕」的大概不只杜光一人，也許在本簡的前頭還有記載其他名捕對象的簡。如此具體描述追捕對象的文件可能被抄錄，並逐級下移到至少部、鄉一級的機關。居延漢簡 20.12 揭露了一部分「詔所名捕」名牒下達的情況：

元康元年十二月辛丑朔壬寅，東部候長=生敢言之候官，=移大守府所移河南

都尉書曰：詔所名捕及鑄偽錢、盜賊亡未得者牛延壽高建等廿四牒，書到度<sup>81</sup>

這枚簡應當是東部候長長生根據「大守府所移河南都尉書」的「詔所名捕」及鑄偽錢盜賊逃亡者名單，在轄區進行搜捕後的回覆。可惜因下文缺簡，不能確定長生的回覆內容。但由此可知，「詔所名捕」的名牒有時會與鑄偽錢、盜賊等其他罪狀者名單一同移交到候官轄下各部，相當於鄉一級的單位來搜捕。從居延漢簡 183.13 第二欄的內容看來，「詔所名捕」的罪行罪狀皆已確定；這點與「逕（逮）捕」主要針對疑犯、證人有很大不同。

<sup>78</sup> 班固，《漢書補注》卷三五，〈荊燕吳傳〉，頁 957。

<sup>79</sup> 原釋「家」，但文意不通，我懷疑是向右下傾斜的「獄」字，詞例參 126.31：「□獄屬所二千石掾」。

<sup>80</sup> 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貳）》，頁 209。

<sup>81</sup> 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壹）》，頁 70。

上述提到的「名捕」無論是在簡牘或傳世文獻中，都常與「詔」有關。例如《漢書·平帝紀》元始四年詔提到：

其明敕百察，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即驗問。定著令。<sup>82</sup>

又如《後漢書·鄭孔荀列傳》載：

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sup>83</sup>

同事在《後漢書·黨錮列傳》記為：「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可見本次「名捕」張儉雖出侯覽之意，實際是以靈帝詔的形式下州郡執行。歷代注家在注解時，亦多將「名捕」等同於「詔所名捕」。例如《漢書·張湯傳》提到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奏張放不法：

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內。<sup>84</sup>

這段敘述中只說「名捕賊」，未言「詔所」，不過劉德注：「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卻判斷是「詔捕」。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載鮑宣事：

時名捕隴西辛興，興與宣女婿許緄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sup>85</sup>

此段亦只稱「名捕」而未冠「詔所」，然師古注此曰：「詔顯其名而捕之。」顯然都視「名捕」為「詔所名捕」的簡稱，個人對此暫持保留態度。

讓我對前引諸注感到疑惑的是「名捕」與「亡人」、「命者」的關係。保科季子探討「亡命」時，曾透過陸機〈謝平原內史表〉李善注的「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將「命者」與「名捕」相聯繫，並據前引居延新簡 E.P.T5:16 的「不知何男子」，認為「名捕」並非罪犯的姓名。再據《二年律令》簡 166：「諸亡自出，減之。毋名者，皆減其罪一等。」推斷「名」是列舉已確定的罪名之意。<sup>86</sup> 倘若「名捕」的「名」果真如保科季子所言，與「命者」的「命」相通，被「名捕」者即「命者」的話。那麼只使用「名捕」來描述時，未必就是「詔

<sup>82</sup> 班固，《漢書補注》卷一二，〈平帝紀〉，頁 144。

<sup>83</sup>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清·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62），卷七〇，〈鄭孔荀列傳〉，頁 809。

<sup>84</sup> 班固，《漢書補注》卷五九，〈張湯傳〉，頁 1227。

<sup>85</sup> 班固，《漢書補注》卷七二，〈王貢兩龔鮑傳〉，頁 1375。

<sup>86</sup> 保科季子，〈亡命小考——兼論秦漢的確定罪名手續「命」〉，《簡帛》第 3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343-357。



所名捕」；因為「命」有時涉及一些不值得下詔追捕的罪。例如《嶽麓書院藏秦簡（肆）》簡 2009、1983 載：

城旦舂亡而得，黥，復為城旦舂；不得，命之。自出毆，笞百。其懷子者大枸櫞及杖之，勿笞。<sup>87</sup>

又同書簡 1976 載：

城旦舂司寇亡而得，黥為城旦舂；不得，命之。其獄未鞠而自出毆，治（笞）五十，復為司寇。<sup>88</sup>

這兩段分別規定城旦舂與城旦舂司寇亡逃時，若捕不得，應「命之」。以秦刑徒之眾，逃亡之濫，不太可能每一個城旦舂逃亡都以下詔方式「名捕」。

個人目前的推斷是，秦漢對逃亡者的追捕，按其輕重至少可分三種層級：一是「詔所名捕」，乃罪行特重，受中央政府注目，搜捕最急者。二是沒有下詔的「名捕」或「命者」，乃有罪某種程度以上，按制度通緝、追捕者。「詔所名捕」與「命者」的差異，從前引居延漢簡 20.12 可略見端倪。該簡中「詔所名捕及鑄偽錢、盜賊亡未得者牛延壽高建等」以「及」字將「詔所名捕」、「鑄偽錢、盜賊」分開，可知不是所有通緝都以「詔所名捕」來處理。「詔所名捕」的重罪犯在所有通緝犯中應是少數。更多的應該是犯盜竊傷害等重罪，但沒有引起朝廷特別關注，僅地方政府各依常制追捕，不必下詔搜捕者。三是「亡人」，乃輕罪甚至無罪逃亡者，只在原戶籍或單位製作名冊，不一定特地遣人追捕。嶽麓秦簡 1397、1372 載：

《尉卒律》曰：為計，鄉嗇夫及典、老月辟其鄉里之入穀，<sup>89</sup> 徒除及死亡者，謁于尉，尉月牒部之，到十月乃比其牒，里相就毆（也）以會計。黔首之闕亡者卒歲而不歸，結其計，籍書其初亡之年月于結，善藏（藏）以戒其得。<sup>90</sup>

邢義田推測，「結其計」是要求自計簿中特別抽出那些逃亡滿一年未歸者的名字，別集為一名籍或簿冊，標明其初亡的年、月。「善藏，以戒其得」是指妥善收藏保存這個特別的名冊，警覺並準備好使逃亡的人歸來或捕獲。<sup>91</sup> 此處的「闕亡者」應當就包括本來無罪，或微罪逃亡者。此類「亡人」沒有發出通緝令追捕的價值，故

<sup>87</sup>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頁 54。

<sup>88</sup>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 55。

<sup>89</sup> 原釋「穀」，本文從邢義田釋「穀」。

<sup>90</sup>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 114。

<sup>91</sup> 邢義田，〈「結其計」臆解——讀嶽麓書院藏秦簡札記之二〉，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07](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07)，2016.03.29)。

只是編造名冊並「善藏，以戒其得」。冀望亡人未來因他事被捕獲，或者自動歸來時有籍可案而已。

## 2. 針對非「詔所名捕」之「亡命」的「逐命」或「命捕」

承上所述，我認定「逐命」或「命捕」是「詔所名捕」之外，按制度追捕一定罪行以上通緝犯之意。此解釋建立在我對「亡命」的「命」之解讀上。故首先有必要介述一下學界對「亡命」的研究成果，以及我個人的看法。

「亡命」的「命」究竟為何種意思，學界還有爭論。基本可以分為將「命」解為確定罪名、將「命」解為名籍，以及將「命」解為通緝三種意見。第一種以保科季子為代表，第二種則以朱紹侯為代表，第三種則見於嶽麓秦簡整理小組的註。前文已經提到，保科季子視「亡命」的「命」為確定罪名，故解「亡命」為「罪名已定的在逃犯」。陶傳祥提出與保科季子類似的意見，主張「命」是定罪名之意，「亡命」乃「因罪逃亡」、「亡人有罪者」，不同於普通人之逃亡。<sup>92</sup> 朱紹侯反對陶傳祥的解法，認為仍應從師古注，將「命」解為名籍，解「亡命」為脫離名籍逃亡。但朱先生也指出，如揚雄〈解嘲〉提到「范睢，魏之亡命也」，<sup>93</sup> 很難解釋成脫離名籍而逃。故在某些情況下，「亡命」只能理解為最寬泛的逃亡。<sup>94</sup> 嶽麓秦簡整理小組針對簡 2009、1983 中的「命之」，提出「出告示緝拿」的解釋。<sup>95</sup> 並將簡 2011 的「命者」解為「逃亡的一類人，即被告示緝拿的逃亡者」。<sup>96</sup>

上述成果中，無論是主張「命」指確定罪名或名籍，都存在朱紹侯所指出，一種解釋無法通讀所有案例的情況。這是什麼原因呢？我認為這與今日的「逮捕」一

<sup>92</sup> 陶傳祥，〈秦漢「亡命」考論〉，《南都學壇》2016.2：6-10。從註腳的引用書目看，陶先生似未曾讀到保科季子的論文，只是偶然提出了相似的解釋。

<sup>93</sup> 朱紹侯先生還認為另外兩個例子的「亡命」只能解成逃亡。一是《東觀漢記》中張歆「守臬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囚詣閣，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便發遣，遂棄官亡命」。但張歆縱放殺人賊，明顯是重罪。故「亡命」也可能是描述他欲逃脫即將來臨的「命」。另一條《後漢書·郭躬傳》的「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本文後文亦有詳論，恐非單純逃亡、逃命之意。故在我看來，朱先生所舉三例中，只有范睢之例的「亡命」較符合逃亡、逃命之意。但揚雄既言「魏之亡命」，亦可理解為范睢所逃乃魏之「命」，那麼又不見得只是逃亡、逃命。不過朱先生所言，只能解成逃亡的「亡命」應當存在，我以為下文所引輕俠王林卿被認定死後的「亡命」即是。

<sup>94</sup> 朱紹侯，〈對幾種「亡命」說的分析與評議〉，《中原文化研究》2017.4：26-32。

<sup>95</sup>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 77，註 58。

<sup>96</sup>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 78，註 82。

樣,其中存在法制文書用語,與普遍性用語的差別。<sup>97</sup> 在文獻中出現,只能解為最寬泛的逃亡之「亡命」,是在非法制領域使用的普遍用法。但如果進入法制領域的使用脈絡,「亡命」就可能與制度連結,具有特別的意思。那麼作為法制用語的「亡命」之「命」是何種意思呢?在這點上,我贊同嶽麓秦簡整理小組的通緝說。以下謹略述個人淺見。

個人基本贊同保科季子「命者」屬於在逃犯的看法,惟不同意其將「命」解為決定在逃犯罪名的手續。我們先看保科季子所引用《二年律令·具律》的關鍵史料,簡 122-124:

人奴婢有刑城旦舂以下至惡(遷)、耐罪,黥顏(顏)類畀主,其有贖罪以下及老小不當刑、刑盡者,皆笞百。刑盡而賊傷人及殺人,先自告也,棄市。有罪當完城旦舂、鬼薪(薪)白粲以上而亡,以其罪命之;耐隸臣妾罪以下,論令出會之。其以亡為罪,當完城旦舂、鬼薪(薪)白粲以上不得者,亦以其罪論命之。庶人以上,司寇、隸臣妾無城旦舂、鬼薪白粲罪以上,而吏故為不直及失刑之,皆以為隱官;女子庶人,無筭(算)事其身,令自尚。<sup>98</sup>

這段律令中提到「有罪當完城旦、鬼薪(薪)白粲以上而亡,以其罪命之」以及「其以亡為罪,當完城旦舂、鬼薪(薪)白粲以上不得者,亦以其罪論命之」。彭浩等所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解「命」為確認罪行。<sup>99</sup> 保科季子亦解兩句為:「都是以原犯之罪而『命』罪,而『亡』或『不得』指不知去向的嫌疑犯,『命』有可能就是針對這些嫌犯的一種罪名確定。」保科季子似認為,逃亡者在最初逃亡之際仍是嫌犯,但是在逃亡之後,政府根據其原犯之罪而確定其罪名,稱為「命」。

我的疑慮之一是,保科季子在論述「耐隸臣妾罪以下,論令出會之」時,一反人文研譯與專修大學將「令」解為使動詞的看法,判斷「令」是與「命」類似,是在「論」之後,將已確定的刑罰通知有關部門的命令。只是「令」以被拘禁的罪犯為對象,而「命」以在逃犯為對象。<sup>100</sup> 按此,保科似乎將「耐隸臣妾罪以下」視為被拘禁的罪犯。可是我認為「耐隸臣妾罪以下」應當是與前一句「有罪當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而亡」相對;即「耐隸臣妾罪以下而亡」的意思。因此「耐隸臣

<sup>97</sup> 另一個相似的例子是「作務」。參高震震,〈試論秦簡中的「作務」〉,《法制史研究》33(2018): 1-36。

<sup>98</sup> 彭浩等,《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頁 141。

<sup>99</sup> 彭浩等,《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頁 141-142。

<sup>100</sup> 保科季子,〈亡命小考〉,頁 350-352。

妾罪以下」者並非被拘禁的罪犯，也是在逃犯。故我還是傾向贊同人文研譯與專修大學將「令」解為使動詞的看法。「令出會之」，是使罪犯自行出來「會」，即面對審判結果的意思。其與前一句「有罪當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而亡」的處理差異在於論後沒有「命」這一程序。<sup>101</sup> 如果「耐隸臣妾罪以下」也是在逃犯，卻未被「命」，那麼將「命」解為確定在逃犯罪名的看法就出現破綻。<sup>102</sup>

我的另一個疑慮是「論」與「命」的順序。後一段中的「其以亡為罪，當完城旦舂、鬼薪（薪）白粲以上不得者，亦以其罪論命之」。從其使用「亦」來看，意在對應前文的「有罪當完城旦舂、鬼薪（薪）白粲以上而亡」。意思是，如果是逃亡得罪，當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者，也視同「有罪當完城旦舂、鬼薪（薪）白粲以上而亡」，應「以其罪論命之」。既然兩種狀況的處理辦法相同，可知「以其罪命之」實際上就是「以其罪論命之」。但為何前文的處理辦法缺了「論」字呢？除了理解成抄寫時缺漏字以外，我認為也可能是「命」必定是「論」之後的程序，所以當提到「命」時，即便沒有提到「論」，官吏也能明白「論」已經完成。我們知道「論」是根據犯罪情節決定犯人懲罰的程序，在「論」之前應該已經確定犯罪事實與罪名。如果「命」是指確定罪名，那麼應當要在「論」之前；可是律文卻以「論命」，將「命」接在「論」後頭。保科季子也認為「命」是「論」之後的司法程序。<sup>103</sup> 但將確定罪名置於決斷刑罰之後，不免予人程序顛倒之感。

此外，保科季子將「命」解為確定在逃犯罪名，而將「亡命」解成「已確定罪名的在逃犯」。然而部分罪犯在犯案後罪名未定的情況下即刻逃亡，在文獻中也稱

---

<sup>101</sup> 「耐隸臣妾罪以下」之所以不「命」，應當是基於微罪沒有通緝逐捕之價值。對於此類人的處理可能如前引嶽麓秦簡 1397、1372 所示，只是編成名冊，並「善藏，以戒其得」而已。這可能就是律文所謂「令出會之」的具體內容。

<sup>102</sup> 劉欣寧與敝人討論時對此段的解讀是，一般定罪必須訊問被告，得訊辭為「鞠」後，再進行論等程序。但被告逃亡時無法進行，故規定若罪行在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可逕行定罪後通緝，稱為「命」。若罪在耐隸臣妾以下，則待本人出面後才定罪。認為「命」、「論」的意義沒有太大差異，故亦稱為「論命」。雖然否決保科季子將「令」解為針對拘禁犯的罪名確定，但還是同意「命」指確定罪名。惟認為「命」在確定重犯罪名之外，也包括發布通緝。問題在於「耐隸臣妾罪以下」，如果是待本人出面才定罪，那要如何判定其罪是「耐隸臣妾罪以下」呢？又如果「論」與「命」差別不大的話，為何「耐隸臣妾罪以下，論令出會之」有「論」卻無「命」？差別安在？故我還是傾向認為「論」、「命」有別。「論」已經包括確定罪名，「命」則是發出通緝並逐捕。

<sup>103</sup> 保科季子，〈亡命小考〉，頁 352。

為「亡命」。例如《漢書·張敞傳》記其五日京兆之事，當張敞以私意論殺不聽命之賊捕掾絮舜後，絮舜之家屬向行冤獄使者投訴：

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sup>104</sup>

使者劾奏張敞賊殺不辜的報告到宣帝手中後，宣帝認為此事不值得讓大臣下獄，故欲給張敞「便利」。具體作法是先下達公卿之前奏張敞與坐大逆誅的楊惲相善，不宜處位之奏，將張敞免官。明明有兩份劾奏，皇帝卻按住重劾而先下輕劾，張敞也就領會皇帝的意思，在上交印綬後便「亡命」了。在張敞「亡命」的當下，由於皇帝的批示還沒下達，應可以認為張敞「賊殺不辜」的罪名還沒確定；否則他不可能在詣闕後還能逃跑。不過這並不代表「賊殺不辜」的案子就不追究了，只是追捕的命令晚一點下達，這就是宣帝給張敞的「便利」。故當「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時：

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sup>105</sup>

所謂「重劾」無疑就是「賊殺不辜」一案，張敞妻子家室恐懼的原因也正是「賊殺不辜」為重罪。不過明習政務的張敞知道，捕「亡命」之民乃郡吏之職，使者不可能為此而來，故立刻明白自己將被皇帝進用。對於張敞在未定罪時逃亡也稱「亡命」一事，保科季子引張敞之例，認為是「棄官亡命」之意：

敞守梟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敞召囚詣閣，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便發遣，遂棄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sup>106</sup>

但只要仔細考慮，就會發現張敞的情節與張敞有所不同。張敞在縱放為父報仇的殺人賊後棄官亡命，是棄了原先守梟長的身分。可是張敞是在已經被免官，連印綬都已繳回的情況下亡命，故張敞在「亡命」當下根本無官可棄。其所欲逃離的是還扣留在宣帝手中，但即將下達的重劾所帶來的追捕。

還有一件奇特的「亡命」的案例是：長陵令何並追捕輕俠王林卿，王林卿情急之下令從奴穿其衣冠、乘其車馬以自代，變服奪小路逃跑。其後：

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乃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

<sup>104</sup> 班固，《漢書補注》卷七六，〈張敞傳〉，頁1420。

<sup>105</sup> 班固，《漢書補注》卷七六，〈張敞傳〉，頁1420。

<sup>106</sup> 范曄，《後漢書集解》卷四四，〈鄧張徐張胡列傳〉，頁535。

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謹誦，以為實死。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sup>107</sup>

由於何並將錯就錯，以奴為王林卿而殺之。是後下至吏民，上至皇帝、太后都認定林卿已死。保科季子也指出王林卿本人的逃亡，很難說是確定罪名後的逃亡，但文獻仍稱之為「亡命」。對此其解釋為：

「亡命」一詞已經脫離了法律上的嚴密用法，成了廣義上的常用詞，可以說「亡命」被誤解成戶籍脫離，已肇始於東漢初年。<sup>108</sup>

意即主要由東漢班固所著的《漢書》，在使用「亡命」一詞時已經不甚嚴格。確實一個詞彙因脈絡不同，在文獻中的用法可能與在律令、行政文書中的定義有差異。故我可以接受「亡命」在文獻中可能脫離法律上嚴密用法的意見。但法制與一般領域中對「亡命」用法的差異，未必要到東漢初年才出現，也有可能更早的時期就存在了。

基於上述疑慮，我雖然敬服保科季子將「亡人」、「命者」別開的卓見，但對其餘下的解釋卻無法盡數同意。個人支持嶽麓秦簡整理小組提出的「出告示緝拿」，即「命」為通緝說。並且，在此說的基礎上還要指出，「命」僅針對背負一定罪刑以上的罪犯。從前引《二年律令·具律》簡 122-124 看來，即便都是因罪逃亡，在漢初的「命」只針對「有罪當完城旦舂、鬼薪（薪）白粲以上而亡」，而不對「耐隸臣妾罪以下」的亡者施行。嶽麓秦簡也只有在城旦舂、城旦舂司寇逃亡的規定中，才提到「不得，命之」。這讓人感到在秦末漢初時，「命」可能只針對罪在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者。我並非要否定保科季子將「命」或「名捕」的「名」解釋為罪名的可能，只是認為罪名並非在「命」這個階段確定，而是在「論」就已經確立。就算「命」或「名捕」的根據確實是罪名，也不是在「命」的時候才確定罪名。

從《後漢書》中的亡命贖罪規定看來，東漢初年「亡命」的標準似乎較秦末漢初有所改變。《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下》建武七年詔提到：

詔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見徒免為庶民。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sup>109</sup>

<sup>107</sup> 班固，《漢書補注》卷七七，〈蓋諸葛劉鄭孫冉將何傳〉，頁 1434。

<sup>108</sup> 保科季子，〈亡命小考〉，頁 354。

<sup>109</sup> 范曄，《後漢書集解》卷一，〈光武帝本紀〉，頁 52。

這段詔書記錄提到「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李賢注的解釋是：「亡命謂犯耐罪而背名逃者。令吏為文簿，記其姓名而除其罪，恐遂逃不歸，因失名籍。」認為亡命指犯耐罪以上而背名逃者。對於這些人讓吏製作文簿，記錄姓名以除罪，以免他們還是不回來，會失去其名籍。我認為李賢注對「以文除之」的解釋是錯的，「以文」應當是根據詔書規定的意思，《後漢書·郭躬傳》載：

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sup>110</sup>

這裡提到的「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就是說赦令的文字沒有提到赦亡命與未發覺者。所以後文郭躬上書才說：「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眾，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按此例可知，建武七年詔的「以文除之」只是交代官吏按詔書內容除亡命者罪而已，並非要官吏去製作亡命者的簿籍。之所以只說「以文除之」，大約是詔書的內容很詳盡，不想一一引述的緣故。關於「亡命」者的優免，在明帝、章帝的詔書中有比較清楚的記載，例如明帝中元二年即位後，十二月甲寅詔：

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縲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sup>111</sup>

又如章帝建初七年詔提到：

亡命贖：死罪入縲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人有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sup>112</sup>

可以發現這兩條開放亡命者贖的規定，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對照一下稍微不同的明帝永平十五年詔：

詔亡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縲四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sup>113</sup>

可以發現不同點在於亡命者贖的代價上，永平十五年詔死罪較中元二年高一倍，贖完城旦與司寇也增加到五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維持十匹的原因不明，價格說不定是根據當時犯罪人口結構的統計數字來調整的。在文獻中，有時詔書敘述比較簡略時，會用「各有差」帶過。例如明帝永平八年詔：「亡命者令贖罪各

<sup>110</sup> 范曄，《後漢書集解》卷四六，〈郭躬傳〉，頁 553。

<sup>111</sup> 范曄，《後漢書集解》卷二，〈顯宗孝明帝紀〉，頁 66。

<sup>112</sup> 范曄，《後漢書集解》卷三，〈肅宗孝章帝紀〉，頁 80。

<sup>113</sup> 范曄，《後漢書集解》卷二，〈顯宗孝明帝紀〉，頁 71。

有差。」<sup>114</sup> 又如章帝元和元年詔：「亡命者贖，各有差。」<sup>115</sup> 由此可知建武七年詔的「以文除之」是類似的意思，即不想贅言該年亡命者逐級贖罪的詳細規定，但交代官吏按詔書規定處理之意。雖然李賢注對「以文除之」的解釋有問題，但他說「亡命謂犯耐罪而背名逃者」應當切合東漢的制度。前引詔書比較詳盡的亡命者贖罪規定，最後都只到「完城旦至司寇」，恰好就是「耐罪」的範圍，似可以推定東漢初「亡命」的範圍就是「耐罪以上」。這種變化可能不是東漢才改動，當與文帝刑法改制相關。恐怕因文帝廢除肉刑，制定期刑，改變了刑罰的輕重結構，導致律令對「亡命」範圍的規定較秦末漢初有所變化。

與前節所述「逮捕」由捕吏根據密件捕人不同，「命」的對象對所有人公開，任何人都可以拘捕「命者」。這點從《二年律令·捕律》簡 153 可以略見：

群盜、命者，及有罪當命未命，能捕群盜、命者，若斬之一人，免以為庶人。  
所捕過此數者，贖如律。<sup>116</sup>

本條律令提到三種人「群盜」、「命者」、「有罪當命未命」如果能捕「群盜」、「命者」或斬之一人，就可以免為庶人。在睡虎地秦簡《封診式》中也有相關的格式案例：

[命]捕

爰書：男子甲縛詣男子丙，辭曰：「甲故士五（伍），居某里，迺四月中盜牛，去亡以命。丙坐賊人□命。自晝甲見丙陰市庸中，而捕以來自出。甲毋（無）它坐。」<sup>117</sup>

本格式模擬的內容是，因盜牛亡命的士伍甲，捕獲了坐賊人亡命的男子丙，將丙帶至官府以「自出」。若按《二年律令·捕律》簡 153，士伍甲應被免為庶人。士伍甲既在有罪亡命的情況下，還敢捕男子丙詣官自出，可見他知道男子丙被官府「命」，也知道捕「亡命」者可解除自己的「亡命」身分。這顯示「命者」的身分應當被官府公昭於世，足以讓「亡命」者互相知曉身分，鼓勵他們互相拘捕，換取自身的免除。此外，本格式的標題歷來都釋為「□捕」，個人懷疑「□」可能為


<sup>114</sup> 范曄，《後漢書集解》卷二，〈顯宗孝明帝紀〉，頁 69。

<sup>115</sup> 范曄，《後漢書集解》卷三，〈肅宗孝章帝紀〉，頁 81。

<sup>116</sup> 彭浩等，《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頁 152。文末「所捕過此數者，贖如律」有些不好理解。因為前文提到只要捕一人就免為庶人。如果「捕過此數」是指捕超過一人，那麼捕獲犯人者按規定僅以所捕一人便可免為庶人，無罪可贖。不知是否可能為「購如律」的誤書。

<sup>117</sup> 陳偉，《秦簡牘合集》第 1 冊，釋文頁 292，圖版頁 743-744。



「命」，即「命捕」。「□」之圖版作「

非「詔所名捕」的「命捕」或「名捕」，按張敞的話是「郡吏當就捕」，程序上不會動用到皇帝使者。從西北漢簡看，逐捕「命者」有時僅由亭長負責。「逐命」的記錄見於金關漢簡 72EBS7C:1：

五鳳四年十二月丁酉朔甲子佐安世敢言之，遣第一亭長護眾逐命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金城郡中。與從者安樂里齊赦之乘所占用馬一匹、軺車一乘，謁移過所縣道河津金關勿苛留，如律令，敢言之。

十二月甲子居延令弘丞移過所如律令 / 令史可置佐安世 正月己卯入<sup>118</sup>

這是由佐安世說明派遣第一亭長護眾追捕「命」，應當就是「命者」的文件。由於逐捕過程必須進出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金城郡中，故按規定說明其從者及所乘車馬資訊，請居延縣移過所縣道河津關放行。從最後一行「居延令弘丞」的「丞」字蓋過右邊的「移」字來看，最後一行是後寫的。表示這份文件應當被送到居延縣廷，由居延令批准後，才書寫最後一行移過所縣道的移文。而左下方的「正月己卯入」，墨色與字跡都與前文不類，大約是金關吏在護眾一行人通過後所作的註記。本例中被派遣「逐命」者不過是亭長及其從者，可見捕「命者」需要動用的層級不一定很高。居延漢簡 117.32 載：「□居延所命髡鉗左止洛都毋崔□」<sup>119</sup> 既云「居延所命」，可見對於這名罪當「髡鉗左止」者的通緝可能由居延縣發出，

<sup>118</sup>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金關漢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6），頁 274。

<sup>119</sup> 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貳）》，頁 31。

追捕可能也由居延縣主理。張敞之所以說應由郡吏來捕自己，可能是對其發布「命」的層級是郡，或者其家所處為郡的轄區。

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後漢書·馮衍傳》注引華嶠《後漢書》提到馮衍為更始將軍廉丹掾，廉丹與赤眉戰死後，「丹死，衍西歸，吏以亡軍，下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sup>120</sup> 所謂「司命」當是王莽所置司命官。《後漢書·馬援傳》提到馬援「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注曰：「王莽置司命官，上公已下皆糾察。」<sup>121</sup> 看來司命的職權包括主糾舉追捕瀆職官吏。大約馮衍被認定有「亡軍」之罪後，獄狀被下達至司命，由司命遣人乘傳逐捕，馮衍為了逃離這種追捕而「亡命」。結合金關簡 72EBS7C:1 與馮衍的例子看來，如果發動「乘傳逐捕」，應是有明確追捕目標的。

雖然不知道亭長要如何在張掖等郡中「逐命」，但他手上可能有逐捕相關的文件或名單，那可能是稱為「讞」的文件，《嶽麓書院藏秦簡（伍）》簡 1021、1019、1016 等簡提到一種追捕「從人」的文書，謹摘錄如下：

• 諸治從人者，具書未得者名族、年、長、物色、疵瑕，移讞縣道，縣道官謹以讞窮求，得輒以智巧譖（潛）訊。其所智（知）從人、從人屬、舍人，未得而不在讞中者，以益讞求，皆捕論之。<sup>122</sup>

「從人」據嶽麓秦簡的其他簡文來看，包括故六國級別較高的貴族，不是普通的夥同從犯。<sup>123</sup> 是在抗秦戰爭中扮演重要角色，為秦所深仇敵視者。治辦這些人的吏應當書寫其名族、年、長、物色、疵瑕等資訊，製作成「讞」，移縣道追捕。倘若縣道還知道某些從人、從人屬、舍人未被捕獲，而不在讞中的，將其資料加進讞中，都捕論之。其中提到的「讞」，學者多指出是一種記錄追捕對象之姓名、族氏、年齡、身高、形貌、特徵的一種通緝文書。<sup>124</sup> 但根據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讞」記錄目標的資訊，卻不一定是為了通緝。《二年律令·金布律》簡 430、431 提到：

<sup>120</sup> 范曄，《後漢書集解》卷二八上，〈桓譚馮衍列傳〉，頁 354。

<sup>121</sup> 范曄，《後漢書集解》卷二四，〈馬援列傳〉，頁 309。

<sup>122</sup>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伍）》，頁 45。

<sup>123</sup>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伍）》，頁 74 註 22-23；吳雪飛，〈《嶽麓簡五》所見「從人」考〉，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052](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052)，2018.04.13)。

<sup>124</sup> 相關討論可見李洪財，〈秦簡牘「從人」考〉，《文物》2016.12：65-71；何有祖，〈里耶秦簡所見通緝類文書新探〉，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19](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19)，2017.01.30)；秦樺林，〈《嶽麓書院藏秦簡（伍）》札記（一）〉，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013](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013)，2018.03.12)。

不幸流，或能產拯一人，購金二兩；拯死者，購一兩。不智（知）何人，廁  
狸而讎之。<sup>125</sup>

不幸落水者，如能救生者一人，賞金二兩，救死者，賞一兩。如果不知道是何人，掩埋而「讎」之。如《二年律令與奏讞書》之注，應是徵求辨認溺死者身分的意思。辨識不幸溺死者並無罪過，而求辨認者亦用「讎」，可知「讎」雖是記載特徵以徵求的文件，但所徵求的未必是罪人。用以求「命者」的「讎」，所根據的資料或許與金關漢簡 73EJT37:776A 所提到的「命籍」有關：

居延部，終更已，事未罷，坐傷人亡命，今聞命籍在頓丘邑獄，願自詣，它  
如爰書。 七月甲辰入<sup>126</sup>

本簡末的「七月甲辰入」，與前引 72EBS7C:1 的左下一樣，墨色筆跡與前文不類，應為金關吏在當事者過關後的記錄。則本簡應當是某份通關文件的最後一支，其內容應當是說明過關的原因。殘文中「居延部」疑接上讀，至於「終更已，事未罷，坐傷人亡命」可能是當事人對自身經歷的說明。似乎是在服役途中犯傷人罪，並為此逃亡。下文「今聞命籍在頓丘邑獄，願自詣」，似顯示當事人希望到擁有自己「命籍」的頓丘邑獄自首。「它如爰書」則暗示通關文件外還有「爰書」可供關吏參考。「爰書」應非犯罪當事人自己製作，可能是當事人先到居延縣等官府自首後，居延縣查出該人「命籍」在頓丘邑獄，為其製作了「爰書」與過關文件，讓他到頓丘邑獄去自首。假設當事人果真是在居延服役時犯傷人罪，照理說應該由事發地點的縣處理；但其命籍不知為何卻被移到頓丘邑獄了。或許頓丘是該人的原籍地，治獄者懷疑他潛回故鄉，所以才移其命籍追捕。由於資料不足，很難確定「命籍」的內容。<sup>127</sup> 從自首歸案要到「命籍」所在地來看，移「命籍」的同時可能也移轉追捕該「命者」的權責。

<sup>125</sup> 彭浩等，《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頁 254。

<sup>126</sup>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金關漢簡（肆）》（上海：中西書局，2015），頁 120。

<sup>127</sup> 審查人指出，據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網站《中國文物報》2017 年 12 月 22 日報導，青島市黃島區土山屯村的 147 號漢墓出土了「堂邑盜賊命簿」、「盜賊命簿」等標題之公文。發掘者說明其內容為「記載所捕盜賊及定罪情況」、「記載所捕盜賊數量及定罪情況」。假如發掘者的判讀正確，那麼「命」應當是確定罪名之意。個人非常感謝審查人指出此資料，但由於簡牘的釋文與照片都未發表，無法確認內容是否有足以證明「命」為確定罪名的證據。對某人發出「命」的時候，會發布該人的犯罪與定罪情況，所以如果「堂邑盜賊命簿」、「盜賊命簿」上有罪名與判刑內容，也毫不奇怪。「命簿」的功能是羅列名單與犯行以便捕捉，而不是定他們的罪。發掘者可能是受傳統「命」為定罪說的影響，才很自然地將「命簿」解為確定罪名。目前公布的訊息還不足以判斷「命簿」的實際功能，恐怕要等發掘報告公布後才能確認。參青島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青島土山屯墓群考古發掘獲重要新發現〉，《中國文物報》2017.12.22，第 4 版。

### 三・秦漢「逕（逮）捕」程序的特殊性及其與今日「逮捕」的關係

基於前述考察可知，秦漢對現行犯的拘捕，常不冠以任何詞頭，逕言「捕」。對於通緝犯，則視朝廷重視程度而定。由朝廷指名通緝者稱「詔所名捕」；不為朝廷注意的一般重罪，則止言「名捕」或「命捕」。無論是「詔所名捕」或「命捕」，對於追捕目標的資訊普遍是公開，並且在遣吏追捕的同時，也鼓勵一般民眾甚至其他「命者」追捕。這與秦漢「逕（逮）捕」在可確認的案例中，是由治獄者傳送密件到所在縣道，遣吏「逮捕」不同。被「命捕」者多已經確認自身已經或即將被「命」，且與一定程度以上的犯罪有關。而被「逕（逮）捕」者有時還處於不知情的狀態，其所涉案件的輕重程度也尚未確定。

上述對於「逕（逮）」與「命」區別的論證，是我綜合所有相關資料後所得出最合理的解釋。讓我感到疑慮的材料是居延新簡 E.P.T51:470 載：

移魏郡元城逕書曰命髡鉗答二百<sup>128</sup>

這條資料記載有「逕書」提到「命髡鉗答二百」，如果「逕書」欲「逕」的對象就是這名「命髡鉗答二百」的罪犯，那本文關於「逕」與「命」區別的結論就應當重新檢討。但由於本簡過於殘斷，無法確定逕書的全文與提到「命」者的脈絡。也可能逕的對象不是命者，「命髡鉗答二百」只不過是逕人前提的一部分。故本文依然認為「逕（逮）捕」與「命捕」在秦漢有一定差異。

若將秦漢的「逕（逮）捕」與今日使用方式比較，會感到今日「逮捕」一詞的使用有一特色，即常有普遍與法定兩種用法。從《漢語大詞典》與《廣辭苑》都可以見到，詞典列出的第一種解釋比較寬泛；第二種解釋則適應本國法令，給予較狹義、切合法條的解釋。各國雖然在法律意義的「逮捕」上不同，但在普遍意義的「逮捕」上卻頗一致：都強調官方拘拿人犯的脈絡。<sup>129</sup> 且普遍意義常滲透進法條，使中華民國與日本法令中不同法條的「逮捕」，必須視情況決定採廣義或狹義。即便法令對「逮捕」的限定最嚴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法學界在探討制度時，有時也以「逮捕」指稱無逮捕證的拘捕，<sup>130</sup> 超出其法條「有逮捕證的拘捕」之限定範

<sup>128</sup> 張德芳，《居延新簡集釋》第3冊，頁289。

<sup>129</sup> 《漢語大詞典》的「捉拿」一詞，出自《元典章新集·刑部·禁搔擾》：「若有違犯之人，捉挈到官，追問是實，遍行懲治。」故也具有官府拘捕人犯的脈絡。

<sup>130</sup> 例如劉國慶，〈論私人逮捕制度——兼論我國的公民扭送制度〉，《雲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7.6（2014）：110-120。該文為了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度與外國比較，採用《美國法律辭典》的「逮捕（arrest）」的定義：「將人置於政府監禁之下的行為」，並討論各國現行犯的「私

圍。對此，最合理的解釋似乎是：普遍意義的「逮捕」用法較早，故各國差別不大。其後，各國才基於普遍意義的「逮捕」，適應各自的法條發展出不同的法律定義。

那麼，今日「逮捕」的普遍意義又是怎麼來的呢？我認為或許就是源自秦漢的「逕（逮）捕」。雖然秦漢的「逕（逮）捕」專指有「逕（逮）書」的拘捕，是一種專門的行政程序。但這個定義建立在特定的制度上，一旦制度修改或消滅，那麼這種狹窄的定義就無可憑依。然而，即便相關制度已經消滅，「逕（逮）捕」長期作為拘拿人犯手續的印象已深植人心。故強調拘拿人犯，或者強調人身拘束脈絡的「逮捕」，在制度消滅後仍殘存下來，被廣泛使用於敘述政府對指定對象的捉拿。並且，在現代國家制定法令時，於各國法條中被賦予新的法律定義。

## 陸・結論

本文論述了秦漢簡牘中「逕（逮）」的意思。認為「逕（逮）」是官吏治獄時，用來徵求與案件相關的嫌疑犯或證人、文件到案的一種辦法。多數的「逕（逮）」採用將「逕（逮）書」送到目標所在縣道官，由縣道官發遣。而「逕（逮）捕」是在治獄吏判斷所「逕（逮）」者可能逃亡或抵抗時採取的手段。就可確認的資料來看，是以密件傳遞至目標所在縣道官，由縣道官遣吏在目標暫不知情的情況下捕獲目標。秦漢時期的「逕（逮）捕」與今日普遍意義的「逮捕」適用於拘拿各種人犯不同，只用於因「逕（逮）書」而拘捕者。

秦漢時期有一定以上罪行的通緝犯稱為「命者」，對通緝犯的拘捕稱為「命捕」或「名捕」而非「逕（逮）捕」。「命者」有時由郡縣遣人逐捕，同時也鼓勵一般民眾甚至其他「命者」追捕歸案。如果受到朝廷關注而下詔拘捕稱為「詔所名捕」，是最高層級的通緝。收到「詔所名捕」命令的單位必須徹底搜索轄下區域，以捕得目標為優先事項。即便搜索後確認目標不在自己轄區，也要向上回報。

至於「逕（逮）捕」的意義是何時轉化，進而形成今日「逮捕」普遍意義的用法呢？根據《漢書·張湯傳》師古注所述唐代制度，以及《明史》對著名民變鄧茂七之亂的記述，秦漢對「逮」的用法及相關制度可能延續了非常久。《漢書·張湯傳》記述張湯幼時：

---

人逮捕」。這顯示即便在中國法學界，為了方便與其他國家比較等原因，對「逮捕」的使用不一定都指其國法令中「有逮捕證的拘捕」程序。

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

師古注本段「傳」字曰：

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逮赴對也。<sup>131</sup>

師古解釋「傳」指「傳逮」，如同「今」之「追逮赴對也」。師古所言的「傳逮」，應取自《漢書·翟方進傳》中翟義「詐移書，以重罪傳逮（王孫）慶」。<sup>132</sup>這是記述東郡太守翟義欲起兵誅王莽，為了召回徵在京師的兵法家王孫慶。故以逮書詐稱王孫慶有重罪，必須傳回東郡會逮。大約師古認為張湯運用的「傳」就是這種「傳逮」程序。但師古可能感到僅用「傳逮」說明，唐代讀者可能還不能明白，因此又追加「若今之追逮赴對也」。所謂的「今」自然是指師古所處的唐代而言，「追逮赴對」可能是唐代人習知的法律用語。從師古在〈翟方進傳〉中注「傳逮」曰：「追赴獄也」來看，唐代的「追逮赴對」也可以稱為「追赴獄」。雖然不清楚唐代「追逮赴對」具體操作情況，但從「赴對」來看，似乎唐代也有由官方通知當事人到案說明的制度。所謂「追逮赴對」，也許是指追尋所逮對象，使之赴官對案的意思。則唐代「逮」作為一種法律用語，至少一定程度沿襲漢舊。又《明史·丁瑄傳》載鄧茂七之亂：

沙縣佃人鄧茂七素無賴，既為甲長，益以氣役屬鄉民。其俗佃人輸租外，例餽田主。茂七倡其黨令毋餽，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攝，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三百捕之。被殺傷幾盡，巡檢及知縣並遇害。茂七遂大剽略，偽稱劇平王，設官屬。黨數萬人，陷二十餘縣。<sup>133</sup>

《明史》提到當田主向縣申訴鄧茂七後，「縣逮茂七，不赴」，其後才「下巡檢追攝」。這個記述方式與前引《奏讞書》中的「逕駮，未來，未捕」很相似。雖然已經「逮」了鄧茂七，但他不來，最後才遣人捕。如此看來，明代的「逮」其實也不能等同於「逮捕」，而可能與秦漢一樣，先製作逮書傳訊被告。考量到秦漢「逮捕」是繫於「逕（逮）」的制度下，其意義寬泛化應該是「逕（逮）」制度消滅，或者

<sup>131</sup> 班固，《漢書補注》卷五九，〈張湯傳〉，頁1222。實際上，師古將〈張湯傳〉的「傳」理解為「傳逮」恐有誤。同傳劉奉世補注便指出：「傳非逮也，若傳逮則不當先言掠治矣。傳者，傳囚辭也。」此處應當從劉奉世理解為傳遞囚犯供辭較妥。

<sup>132</sup> 班固，《漢書補注》卷八四，〈翟方進傳〉，頁1486。

<sup>133</sup> 清·張廷玉等，《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80），第7冊，頁4467。

不再以「逕（逮）」稱述傳訊、調查案件相關人物、證物之後的事。如果一直到明英宗正統年間鄧茂七之亂時，「逕（逮）」制度都還存在，那麼今日「逮捕」意義的寬泛化，或許是很晚近的事。

當然，無法確定「逮捕」的寬泛定義是制度消滅以後才形成的。如同今人未必明白所有詞彙的法律定義一般。秦漢時期不熟悉律令的一般人，可能也難以區分「逕（逮）捕」與「命捕」有什麼差別；也許會誤將「逕（逮）捕」應用在政府對所有人犯的拘捕上。而語言本為約定俗成之事，可以想見在非法制領域的使用上，普遍意義會逐步壓倒法律意義，甚至反過來滲透法制領域。故也不能排除意義比較寬泛的「逮捕」，在制度尚未消滅前的某一時期就廣泛通行的可能性。

（本文於民國一〇八年三月六日收稿；同年八月二十二日通過刊登）

## 引用書目

### 一・傳世文獻

-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高誘注，《呂氏春秋》，臺北：藝文印書館，2009。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4。  
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2。  
漢・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6。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清・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62。  
清・張廷玉等，《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80，第7冊。

### 二・出土史料

-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金關漢簡（肆）》，上海：中西書局，2015。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金關漢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6。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  
青島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青島土山屯墓群考古發掘獲重要新發現〉，《中國文物報》2017.12.22，第4版。  
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張德芳主編，《居延新簡集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第1冊、第3冊、第7冊。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伍）》，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第1卷。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第1冊。  
彭浩等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1：8-2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  
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貳）》，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  
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



### 三・近人論著

王兆鵬

- 2004 〈論拘提或逮捕相關問題〉，《日新半年刊》3：8-21。

朱孝清

- 2010 〈論附條件逮捕〉，《中國刑事法雜誌》2010.9：3-10。

朱紹侯

- 2017 〈對幾種「亡命」說的分析與評議〉，《中原文化研究》2017.4：26-32。

宋英輝譯

- 2000 《日本刑事訴訟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李洪財

- 2016 〈秦簡牘「從人」考〉，《文物》2016.12：65-71。

邢義田

- 2011 〈秦或西漢初和姦案中所見的親屬倫理關係——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奏讞書》簡 180-196 考論〉，氏著，《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頁 489-539。

保科季子

- 2008 〈亡命小考——兼論秦漢的確定罪名手續「命」〉，《簡帛》第 3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343-357。

宮宅潔著，徐世虹譯

- 2003 〈秦漢時期的審訊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見〉，楊一凡、寺田浩明、初山明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287-322。

高震寰

- 2013 〈從《里耶秦簡（壹）》「作徒簿」管窺秦代刑徒制度〉，《出土文獻研究》第 12 輯，上海：中西書局，頁 132-143。

- 2018 〈試論秦簡中的「作務」〉，《法制史研究》33：1-36。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編

- 2005 《行政法律規章司法解釋全書》，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郭錫良

- 2017 《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

陳松長

- 2004 〈《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校讀（八則）〉，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編，《簡牘學研究》第 4 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頁 21-26。

高震寰

陶傳祥

2016 〈秦漢「亡命」考論〉，《南都學壇》2016.2：6-10。

《漢語大詞典》編委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

2003 《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第2刷。

劉欣寧

2017 〈秦漢訴訟中的言辭與書面證據〉，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5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339-371。

劉國慶

2014 〈論私人逮捕制度——兼論我國的公民扭送制度〉，《雲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7.6：110-120。

新村出編

2018 《広辞苑》，東京：岩波書店，第7版第1刷。

#### 四・網路資訊

中國人大網，權威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11/05/content\\_2065631.htm](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11/05/content_2065631.htm)，讀取2019.07.03。

中華民國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中華民國憲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00001>，讀取2019.07.04。

中華民國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刑事訴訟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C0010001>，讀取2019.07.04。

何有祖

2017 〈里耶秦簡所見通緝類文書新探〉，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19](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19)，2017.01.30。

吳雪飛

2018a 〈《嶽麓簡五》所見「從人」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052](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052)，2018.04.13。

2018b 〈說里耶秦簡（貳）中的「相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109](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109)，2018.05.17。

邢義田

2016 〈「結其計」臆解——讀嶽麓書院藏秦簡札記之二〉，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07](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07)，2016.03.29。

秦樺林

2018 〈《嶽麓書院藏秦簡（伍）》札記（一）〉，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013](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013)，2018.03.12。

國家教育研究院維護，《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web.cgi?ccd=xsVJIh&o=e0&sec=sec1&op=v&view=0-1>，讀取 2019.07.04。

陳偉

2013 〈里耶秦簡中的「夬」〉，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16](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16)，2013.09.26。

陳劍

2011 〈讀秦漢簡札記三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518>，2011.06.04。

日本〈刑事訴訟法〉，日本 E-GOV 電子政府の総合窓口：[https://elaws.e-gov.go.jp/search/elawsSearch/elaws\\_search/lsg0500/detail?lawId=323AC0000000131](https://elaws.e-gov.go.jp/search/elawsSearch/elaws_search/lsg0500/detail?lawId=323AC0000000131)，讀取 2019.07.02。

日本〈刑法〉，日本 E-GOV 電子政府の総合窓口：[https://elaws.e-gov.go.jp/search/elawsSearch/elaws\\_search/lsg0500/detail?lawId=140AC0000000045](https://elaws.e-gov.go.jp/search/elawsSearch/elaws_search/lsg0500/detail?lawId=140AC0000000045)，讀取 2019.07.02。

## The Institution of “dài” (逮) and “dài bǔ” (逮捕)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Chen-Huan Kao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Regarding “dài”(逮) in the Qin wooden slips, there are primarily two scholarly explanations. According, “dài” denotes either “to arrest” or “to summon.” However, these explanations are accurate only partiall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dài” originally referred to a legal procedure wherein suspects were brought to the court through different means by the magistrates, who would then render their adjudications according to the severity of the crime committed. If the purpose was to summon witnesses or suspects of petty crimes, the magistrates would issue official documents called “dài shu”(逮書) to the counties or affiliated units of said targets, requesting their presence at the court to deliver further explanations. In short, this usage is similar in function to today’s summons. As regards felons at large or escaping arrest, the magistrates would issue classified arrest warrants to request relevant counties or units to make swift arrests of the criminals without their prior knowledge and transport them to the judicial court. Such arrests made as per “dài shu” were therefore called “dài bǔ”(逮捕). However, “dài bǔ” was one of many methods of “dài” but not necessarily its equivalent. The usage is different in present-day meaning in regards to making an arrest of a person in flagrante delicto or a wanted criminal.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dài bǔ” meant capture and detainment in the process of “dài.” As such, the capture of wanted felons was called “míng bǔ” (名捕) or “zhú mìng” (逐命), rather than “dài bǔ.”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a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 practice of “dài” similar to today’s summoning procedure lasted until mid-Ming. The multiplicity in the definition of “dài bǔ” may have been a much later occurrence.

**Keywords: wood slips, arrest, summons, wanted, fugitive**